



《记忆》八十四期目录

【专稿】

余汝信 中央文革小组情报搜集机制述略

【评论】

啟之 浩然与《金光大道》

戴煌 “阳谋”究竟萌发于何时？

【忆往】

廖振旅 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

【序跋】

啟之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前言与编后记

【访谈】

文静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二）

【检讨书】

李慎之 胡乔木在1956-57年间的一些右派言论（1968-9-15）

【书讯】

韦陀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在台湾出版

向胡杨 《阅读文革》在香港出版

【资料】

任冬林整理 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一）

——万恶的封建制度、野蛮的地主阶级湖南土改

【来信选登】

- 1、宋淮云谈刘进的广播讲话
- 2、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 3、匡卫群：“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
- 4、沈迈克（Michael）谈文革资料收藏

【专稿】

中央文革小组情报搜集机制述略

余汝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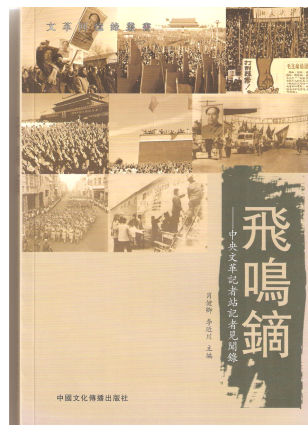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至1967年8月一年间，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期。在此期间，中央文革小组建立并通过自己的情报搜集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以了解、掌握并反映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

一、有关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文字叙述

迄今为止，有关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公开文字叙述，几乎全部为当事人的回忆。其中，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首发于《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及记者李近川的《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首发于《百年潮》2002年第5期）较为详尽。上述两文，已收入近日香港出版的《飞鸣镞——中央文革记者站见闻录》一书中，同时收入本书的，还有多位记者的回忆文章。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建立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由其办公室（1966年7月成立）下设的调查组、简报组负责文革动态搜集工作。据王广宇称，调查组的任务，是调查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央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由办公室副主任曹轶欧兼组长；简报组主要负责编辑《文化革命简报》，由办公室另一位副主任戚本禹兼组长，成员有靳耀南、范恭俭、阎长贵、李思温。

据李近川称，1966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派一批记者，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去全国各地为中央调查文革情况。最早被选调的，是二十多名新华社驻各军种、军区的军事记者。这批人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经短期集训后，



转住到钓鱼台宾馆斜对面的花园村一号院¹，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宣布成立中央文革记者站。

李近川称，王力给记者站确定的领导体制是：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受中央文革办公室领导；派驻各地的调查采访工作，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领导，只对中央负责；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近川又称，当时明确了工作方式：去外地的记者组，持《解放军报》的介绍信和记者证，住各地军事机关，由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讯、办公等工作条件。在当地党政军民学等各界中，独立调查研究，自主采写稿件。稿件一般要用保密电话，少量适合的用机要传递或邮寄，传给设在北京的记者站。

李近川还称，经周恩来同意，从1966年9月至1967年2月，陆续从中共中央办公厅、新华社、《人民日报》、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空、海军及沈阳、济南、北京、南京、成都、广州等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来站工作。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又由成都等军区调进6人补充力量，还从《工人日报》调进两名记者。最多时，采编人员和行政人员（不含印刷厂、通讯和后勤人员）达200多人。另外后期还吸收了少量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联络员使用。

据统计，在前后215名采编、行政人员中，现役的新华社军事记者27人，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记者、编辑15人，马列主义研究院13人，解放军政治学院24人，海、空军及各大军区军队干部135人，中央办公厅1人。以上现役军人共186人，占人员总数的87%，非军籍人员29人，占13%。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在情报搜集过程中，主要是借用了军队的力量。不仅是借用了军队当时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而且，借其渗透军内以搜集军内情报的便利性，是非军籍人员远不可比拟的。

据记者王文仲称，刚到记者站，即宣布了保密纪律：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地址对外保密，只能说代号“811信箱”。此保密要求，确十分符

¹ 花园村实际上是在钓鱼台宾馆的西北，离钓鱼台有三、四里路。

合情报机构的职业特征¹。

此前，中央并非完全没有各地文革运动进展情况的情报搜集手段，起码，有一个完备的新华社的系统。但是，原先的新华社系统，并不是毛泽东可以完全信任的。这种不完全信任的态度，可体现在中央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熊复 1966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的发言中。熊复称：新华社 500 多名记者，28 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 100 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²。

惟中央文革记者站运作之后，新华社的系统仍继续运行，编有《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毛泽东对其亦曾有过批示³。所以，我们说“不完全信任”，而非“完全不信任”。以毛的信任度而言，属于旧官僚体系的新华社自然远远不及自己老婆掌握的新事物。

以下为解放军政治学院参加记者站工作人员情况——

姓名	原部职别	原级别	起止时间	派往地区
甄文君	二大队三队队长	12	1966.9-1967.2	上海
张云勋	政治部干事	18	1966.9-1969.5	贵阳
刘希政	哲学教研室教员	18	1966.9-1967.9	贵阳、重庆
张子良	二大队二队队长	12	1966.9-1966.12	贵阳
刘善庭	二大队一队副政指	13	1966.9-?	成都
孙 浩	政工教研室教员	14	1966.9-1966.12	成都、重庆
郑晓枫	时事政策教研室教员	14	1966.9-1969.3	上海
王天祥	院务部干事	18	1966.9-1967.12	成都
陆成辉	训练部秘书	18	1966.9-1969.5	北京记者站

¹ 王文仲：〈联通组概述〉，载《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见闻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12月版，页33。

²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106。

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31。

蒋保祺	时事政策教研室助教	22	1967.1-1969.5	成都、上海
朱士高	《思想战线》帮助工作	22	1967.1-1969.5	哈尔滨
姜宏周	哲学教研室助教	21	1967.1-1969.5	广州
陈梅朴	哲学教研室助教	21	1967.1-1969.5	北京记者站
廖惠和	哲学教研室助教	22	1967.1-1969.5	西安、成都
方锡金	政经教研室助教	22	1967.1-1969.5	福州
王西宾	时事政策教研室助教	22	1967.1-1969.5	鞍山、银川
崔俊峰	政治部帮助工作	22	1967.1-1969.5	昆明
曲汉奎	政治部帮助工作	22	1967.1-1969.5	鞍山、沈阳
李生荣	时事政策教研室教员	21	1967.1-1969.5	成都
于顺昌	哲学教研室助教	22	1967.1-1969.5	内蒙
王志刚	政治部帮助工作	22	1967.1-1969.5	太原
张金才	训练部帮助工作	22	1967.1-1969.5	哈尔滨
贺源	党史教研室秘书	23	1967.1-1969.5	石家庄
孙璞方	时事政策教研室助教	22	1967.1-1969.5	南昌 ¹

上表说明，政院派出人员分两批，首批9人行政级别较高，为准师至副营级干部；第二批15人行政级别较低，绝大多数为排级干部。

从上表还可以看出，政院派出的首批人员，部分在记者站的时间并不长，如甄文君，1967年2月已离开。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33的一个注释，透露了可能的个中玄机。该注释称，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到上海的甄文君，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了张春桥在安亭与工人谈话的情况。甄说：“有少数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有意见，说只讲

¹ 解放军政治学院整党办公室：《对参加中央文革记者站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8月29日。

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王年一称，甄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惟甄的所为，是否为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悦而将其“退回”政院，指令另派一批更易控制的年轻干部取而代之？笔者未能证实¹。

据王广宇称，记者站正式建立机构以后，指定了徐学增、陈满池和李德泰三人负责，“徐是召集人、联系人。这三位都是部队调来的，徐学增是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军事记者组组长，陈满地、李德泰（是）分别来自沈阳和济南部队的师级干部。”

据笔者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称，记者站下设编辑组、通联组、秘书组、后勤组，以及派到全国各地的记者组。通联组负责接收和抄录各地记者组的稿件、电话，初审、登记后送编辑组，由编辑组编成《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不用的稿子存在记者站²。

电话记录卡片

来源单位及电话	16路电报局2分机	处理意见
来部人姓名	王广宇 1967年5月14日	时
来部内容	王广宇电话 王广宇电话时间今日11时 12时57分40秒 昨天下午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记录如下： 1.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2.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3.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4.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5. 王广宇电话到于记者站	
接部人：		

王广宇称，关于中央文革的记者使用记者证的情况，基本上是以中央新闻单位的政治行情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记者证，因为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是不公开的，在当时哪家报社“红”，就用哪家的记者证；初期用过《光明日报》、新华社的记者证，后来《解放军报》“红”了，又用解放军报社的记者证。1967年1月，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辑胡痴被打倒，又改用《红旗》杂志社的记者证。

记者站的活动，大体分为两段。从1966年9月至1968年2、3月为第一段，此期间，主要是了解全国各地的文革情况，编辑《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即开展记者站本身业务工作阶段；从1968年3月至1969年春为第二段，此期间，记者站业务工作停止，将记者全部集中在北京记者站内，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记者站领导的“罪行”。此段时间，记者站原领导全部靠边站，经群众

¹ 甄文君于1967年12月出任新华社军管小组副组长。

² 解放军政治学院整党办公室：《对参加中央文革记者站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8月29日。

选举，领导批准，选出以魏知新（三十八军干部）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运动。运动中还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等进行批斗，记者站领导徐学增等人也交全体人员批判斗争，记者之间相互揭发。1969年4、5月份，运动结束，记者站解散，人员返回原工作单位。

二、《文化革命简报》略说

据王广宇称，《文化革命简报》原由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置和主管，1966年7月上旬，迁入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所在地——钓鱼台宾馆十一号楼。

此外，《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有同名内刊，毛泽东有关播发聂元梓大字报的批语，就写在《红旗》、《光明日报》1966年5月27日编印的《文

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¹。据知情人称，此内刊与戚本禹主管的《文化革命简报》似无关系。

1966年7月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前，《文化革命简报》的采编方式目前尚未清楚。1966年7月后，由中央文革办公室编印，1966年9月记者站成立后，由记者站采编，以中央文革办公室（后为办事组）名义编印。

来稿登记卡片 编号:

地区	北京	时间	1967年2月9日	时	分
来稿人姓名	刘希文	接稿人姓名	孙志		
来稿题目	刘希文给《红旗》杂志编辑部来信				
编辑意见	已综合 (签字) 118				
审稿人意见	(签字)				
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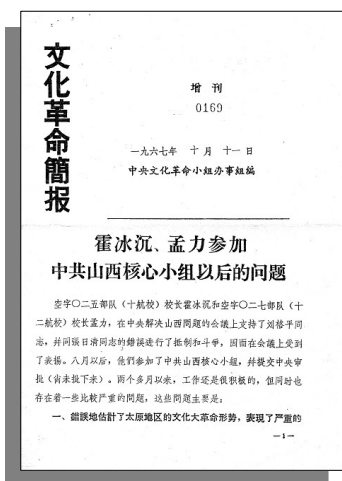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毛泽东1967年2月9日对2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390期登载的一篇题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材料作了批示。3月27日，毛又对3月26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35期登载的一份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来信摘要作了批示。以2月7日至3月26日共48天印发了46期计算，《文化革命简报》应该几乎是每

¹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62。

天一期。5月7日，毛对5月5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的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作了批示，以3月26日至5月5日共41天印发了36期计算，大致上也几乎是每天一期。

此外，《文化革命简报》还有不定期的“增刊”。

据笔者看到的《文化革命简报》（复印件），未有标示密级，其发送范围复印件上未见标示。因笔者见到的只是5页的复印件，可能发放范围在第6页上而未有复印，因此，发放范围复印件上未见标示不等于说原件上没有标示。据王广宇告诉笔者，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发送范围较广，“可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和文革



小组成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范围收窄，但“具体情况也记不清楚了”。

现将1967年10月11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增刊全文照录如下。从该文可以看出，记者对文革运动事态的反映是带有自己强烈的思想倾向的。

霍冰沉、孟力参加中共山西核心小组以后的问题

空字〇二五部队（十航校）校长霍冰沉和空字〇二七部队（十二航校）校长孟力，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支持了刘格平同志，并同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而在会议上受到了表扬。八月以后，他们参加了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并提交中央审批（尚未批下来）。两个多月以来，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错误地估计了太原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表现了严重的极“左”情绪¹。七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以后，山西形势一片大好。

¹ 文内加粗部分，原文如此，下同。

但是霍、孟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估计，他们认为：“山西的保守势力很大，看来很可能大乱，思想上要有准备。”并说：“张日清的问题还没有搞臭，影响没有肃清，要防止张日清东山再起，现在中央还保他，材料弄够了，中央就不保了。”他们认为，中央会议之后，六十九军的态度是“上转下不转，明转暗不转，外转内不转，口服心不服，弄不好，在山西很可以发生武汉事件。”因此，他们错误提出：“当前，要特别警惕六十九军，很可能带代替张日清，成为山西保守势力的后台。”他们还说，过去六十九军支持的大部分是“红联站”的，现在又支持“兵团”（即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并指示“红联站”打入“兵团”。他们认为，对“红联站”在中央会议之后，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变，而是“更狡猾、更毒辣、更嚣张”，应当注意“红联站”的动向，把它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当时，有些群众组织对袁振同志有些意见，孟力等也含沙射影地攻击袁振同志，他们说：“兵团是有后台的”，“袁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表态总是在刘格平同志的前边，给刘格平同志制造困难”，等等。总之，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阶级敌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指向六十九军，指向袁振同志，指向“兵团”和“红联站”群众组织。几个月以来，经常直接向群众组织“红总站”散布，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片面地支持“红总站”，贬低和攻击“兵团”，影响两大左派组织的团结。他们对于“红总站”一方面大加鼓吹，以表白自己。霍、孟经常对“红总站”的负责人说：“‘红总站’中央信得过，格平信得过，我们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指坚决支持），我们的看法，刘格平同志是同意的。”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帮助“红总站”工作或当顾问。而对“兵团”，则到处搜集他们的情报，提供给“红总站”。他们还经常说，山

西还是出现反复，这次反复一定出在“兵团”和“红总站”之间。把兵团当成作战对象。由于他们支持一方，打击一方，使“红总站”提出“外仗内打”的错误口号；“兵团”的大字报也上街要揪丁磊（“红总站”主要负责人）。因此直接影响了山西革命大联合、大批判的健康发展。

三、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背上了“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和“功臣自居”的包袱。在核心小组会议上，对曹中南（六十九军政委）、陈金玉（山西军区司令员）很不尊重。据袁振同志和曹中南同志反映（很多是记者在场），霍、孟经常影射曹、陈是两面三刀，不支持刘格平。九月六日晚上，霍当着刘格平的面粗暴地打断陈金玉的发言，与陈顶了起来。曹中南同志对记者说：“我们目前工作这些困难就是十航校跟我们为难，弄得我们不好说话。他们在下面到处支持我们的对立面。”袁振同志也向记者说：“霍冰沉同志很没有水平，对曹中南同志和陈金玉同志一点也不客气，就是压制人家。”曹中南、袁振等同志都认为孟力在晋南支左中，犯有严重的错误，完全执行了张日清的错误路线，当知道中央的精神以后，才起来炮轰张日清的，而且一开始就提出打倒的过“左”口号。八月份后，虽经刘格平几次说服，十航校在批判张日清的会上，不要摘帽徽、领章，坐喷气式飞机、插小旗等。但是霍、孟从来不理。八月中旬，陈永贵、谢振华二同志带着周总理和康老的指示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委托去处理平遥事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表扬。霍冰沉却很不服气地说：“冲锋陷阵，挨打受伤是我们穿蓝裤子的（指空军），受表扬的是六十九军。最后写材料突出谢振华。”九月三日，《人民日报》点名表扬了六十九军，十航校就找新华分社质问：“为什么没有我们〇二五部队？山西

这么多军队，为什么只提六十九？”霍冰沉也说：“这是怎么搞的？
做工作找上我们了，出好事受表扬找上六十九军了。”

四、给刘格平出坏主意。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期间，“红联站”几次要求刘格平同志经常接见讲讲形势，刘格平同志答应了，但在一次接见之后，霍冰沉却向格平同志说：“‘红联站’的观点根本没有改变，你不能去，什么时候改变了什么时候才能去。”在“九·五”事件中，“红总站”包围了“红联站”，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血战。当时“红总站”有武攻的情绪，霍冰沉也主张进行武攻，几次向刘格平同志提出武攻的建议。这些冒险主义的政策，由于受到刘格平、曹中南、袁振的拒绝才没有实行。

五、耍两面手法，在晋南问题上不执行核心小组的决定。孟力在晋南的支左的工作中，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与晋南军分区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造反派，突出的是把山西师范学院的“造反大队”打成“反动保皇组织”。核心小组提出这样作是错误的，应当进行平反。孟力在会上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执行，但回到晋南以后却发表了一个违背小组决定精神的声明。

综上所述，霍、孟在参加了核心小组以后，表现了严重的极“左”情绪、宗派主义、骄傲自满、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派性，等等。他们的一些活动，已经引起了核心小组其他同志的不满和戒备，也激起了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

（记者 陆咸辉 王志刚 吕继周）

记者对霍、孟两人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1967年底中央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召开之后，十航校（已改称第三航空机务学校）与十二航校退出了山西的三支两军工作，经中央同意，增补谢振华为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陈

金钰为省核心小组成员，霍、孟不再为人提及。未知上文对霍、孟离开省核心小组是否起了一定作用，幸亏霍、孟两人在军内的仕途未受什么影响。霍冰沉仍任三机校校长至1970年该校停办，调任空六军副参谋长；孟力仍任十二航校校长至1973年升任空七军副军长，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均享受离休待遇。

三、印数极少的《快报》

《快报》是目前已知的由中央文革记者站采编、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印发的两种情况简报中的第二种。

有关《快报》的缘起，有多种说法。据王广宇告之笔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立以后，委托解放军报社成立一个《快报》组，编印《快报》反映各地文革情况。1966年末，《快报》负责人宋琼（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其后办公室改名办事组，宋琼即任办事组组长，《快报》也就从军报搬到记者站来编印。

目前，并未有实物资料可以证实上述说法的确切性。而据当时在《解放军报》任职的卢弘所著《“红太阳”的影子》与《军报内部消息》称，1966年国庆前后¹，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被安排到《解放军报》，一来就在“极其机密”的“快报组”工作。卢弘还说，宋琼至中央文革办事机构任职时，确是将“快报组”几个人带了过去。1967年1月，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由她发起，查封了设在解放军报社而应属中央文革的“快报组”，江青指示，将宋琼等人一脚踢出了中央文革²。卢弘的说法，从侧面证实了王广宇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惟根据现有材料，解放军报社的“快报组”与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关系，尚有颇多不明晰之处。如“快报组”是否具有情报搜集功能还是纯编辑功能？在肖力造反之前，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稿件亦交给“快报组”吗？《快报》脱离解放军报

¹ 有说应在1966年11月份。

² 卢弘：《“红太阳”的影子》，香港：七星书社，2010年11月版，页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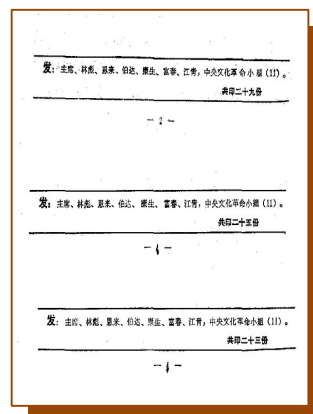
社的时间，是在肖力造反前的 1966 年 12 月，还是肖力造反后的 1967 年 1 月？

“快报组”时期（尤其是前期）的《快报》，是以什么名义编印的？（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及的 1966 年 12 月 21 日《快报》第 748 号，是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名义编印的。）

如以 1966 年 12 月 21 日编印的第 748 号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及的 1967 年 2 月 25 日编印的第 1334 号计算，共 67 天印发了 587 号，平均每天为 8 至 9 号。

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提及的和笔者所见的实物（复印件）计算，从 1967 年 2 月 25 日编印的第 1334 号至 6 月 19 日 20 时编印的第 2664 号，为 115 天共印发了 1331 号，平均每天 11 至 12 号，此为 1967 年上半年大致的印发密度。

从 1967 年 7 月 15 日 24 时编印的第 3096 号至 8 月 8 日 24 时编印的第 3709 号，仅 25 天就印发了 614 号，平均每天 24 至 25 号，此为各地两派斗争至为激烈阶段的最高印发密度。从 1967 年 10 月 12 日 20 时编印的第 4852 号至 12 月 29 日 20 时编印的第 6076 号，为 79 天共印发了 1225 号，即平均每天 15 至 16 号，此为 1967 年 9 月后各地两派斗争有所缓和收敛后的印发密度。



此外，《快报》亦有增刊，以所见 1967 年 4 月 14 日 23 时 0159 号至 7 月 24 日 21 时 0358 号计算，为 102 天共印发了 200 号，几近每天两号。

《快报》与《文化革命简报》相比较，前者印发的密度（每天数号至二十多号）远比后者（每天一期）高。前者时效性强，篇幅一般较短；后者篇幅较长，反映的内容较为具体、详细。比《快报》更简捷的，是中央文革办事组上报的《要事汇报》。据王广宇告之笔者，《要事汇报》每期最长不超过两百字，都是需要马上请示处理的紧急要事，情报来源主要出自办事组的电话组和长途电话组而非记

者站，“一天不定搞几期”，“发放范围主要就是周和文革小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也送毛泽东、林彪”。

《快报》在首页左上角标示有最高等级的密级（本文在发表时因可以理解的原故已作技术性处理）。在末页标示有发送范围及印数。以笔者所见，1967年2月直至年底的发送范围，为政治局常委中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江青（列名于李富春后）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印数最少为23份，最多29份，其中中央文革小组11份。发送时每份都打上了编号。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多处引用了《快报》的材料（这也说明在王年一当年的写作过程中，有关方面是给予了极大的方便的）。如书中提及，1966年12月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派人至四川揪彭德怀的任务的情况，1966年12月21日编发的《快报》第748号作了报道；1967年7月24日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彭真，当日编发的《快报》第3382号即作了报道；1967年7月26日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在北航召开近十万人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同日国家体委等单位的七十多个群众组织约六千人召开“揪斗反党篡军头目贺龙大会”（贺龙未出场，会上揪出荣高棠、李梦华“示众”），当日编发的《快报》第3396号均作了报道；1967年8月22日夜，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第二天（8月23日）编发的《快报》第4052号立即对事件经过作了报道。

这就间接地表明，类似上述严重事件及情况，《快报》均一一有所反映。每天能看到十多二十份《快报》的毛泽东，应对全国类似情形了如指掌。1967年全年《快报》六千余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作了批示的仅五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未有列入的，不等于说毛就没有作过批示，更不等于说毛没有看过。官史说毛对很多事毫不知情，受江青等人所利用所蒙蔽，自然是罔顾事实，为毛开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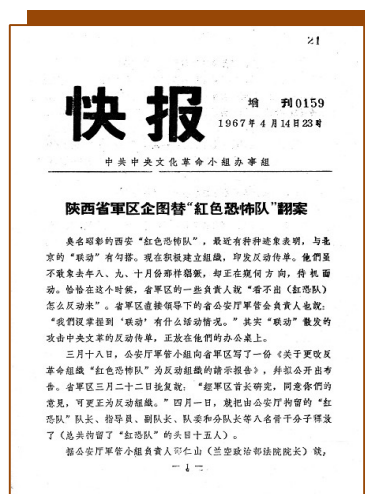
四、从《快报》看记者站触角所及

1、西安：军内动态

西安“红色恐怖队”，1966年9月间成立，为西安最早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之一，主要成员大都为西北局、陕西省委及部分军队干部子弟。“红色恐怖队”与北京“西纠”、“联动”关系密切，“红八月”后西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基本上是“红色恐怖队”所为。

1967年1月，被指为“反革命组织”，部分成员被审查关押¹。

1967年2月，夺权风暴冲击下的陕西乱象纷呈。3月3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陆军第二十一军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持左派统一指挥部”，3月9日，



改名为“西安地区驻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增加总后驻西安办事处为指挥部成员，后又组成“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对西安地区以至全省实行“三支两军”。4月23日，毛泽东在当月21日编印的《快报》第1940号刊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材料上批示：“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²。”未见下文前，只知道记者讲了陕西省军区和陕西驻军负责人的好话，殊不知几乎同时背后另被打了一枪。

下文刊载于1967年4月14日23时编印的《快报》增刊第0159号。

陕西省军区企图替“红色恐怖队”翻案

¹ 参见白磊博客：书吃的文字世界。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18。

臭名昭彰的西安“红色恐怖队”，最近有种种迹象表明，与北京的“联动”有勾搭。现在积极建立组织，印发反动传单。他们虽不敢象去年八、九、十月份那样猖獗，却正在窥伺方向，待机而动。恰恰在这个时候，省军区的一些负责人说“看不出（红恐队）怎么反动来”。省军区直接领导下的省公安厅军管会负责人也说：“我们没掌握到‘联动’有什么活动情况。”其实“联动”散发的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正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三月十八日，公安厅军管小组向省军区写了一份《关于更改反革命组织“红色恐怖队”为反动组织的请示报告》，并拟公开出布告。省军区三月二十二日批复说：“经军区首长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可更正为反动组织。”四月一日，就把由公安厅拘留的“红恐队”队长、指导员、副队长，队委和分队长等八名骨干分子释放了（总共拘留了“红恐队”的头目十五人）。

据公安厅军管小组负责人邵仁山（兰空政治部法院院长）谈，派了很多干部调查，“红恐队”做的反动的东西不多。他们只抄了三家，而且抄得对，因为被抄的都是成份不好的人家。还说：有些坏事是别人做的，而安在他们的头上。有些人不是“红恐队”的，却戴着“红恐队”的袖章去干坏事。“红恐队”打的坏人多。参加“红恐队”的都是些青年娃娃，若说是反革命组织，几百个青年娃娃都成了反动分子，他们的一生怎么办？还说：“过去把情节夸大了向中央报告，中央当然点头。现在要追查一下，究竟是谁向中央报告的？”

最近，公安厅军管小组还准备释放“红恐队”的“司令”张文广等人。

革命群众议论说：“实行军管以后，军区抓人很积极，可是让他

们抓‘红恐队’就没劲了，因为参加‘红恐队’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儿女。”

这种议论是忠<中>肯的。“红恐队”司令张文广，即是原军区副司令张开基的儿子；其他四名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军区大干部的娃娃”。如袁继春，是军区政委袁克服的儿子；闵运亭，是军区副司令闵洪友的儿子；王晓英，是军区副司令王明坤的儿子；李涛，也是军区某负责人的儿子。群众反映说，正是：党纪国法虽严，奈何骨肉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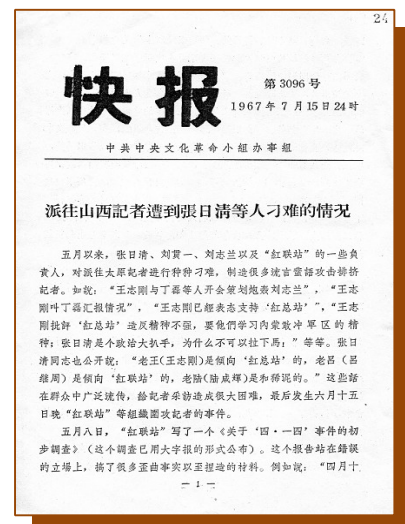
(记者 廖惠和)

2、太原：高层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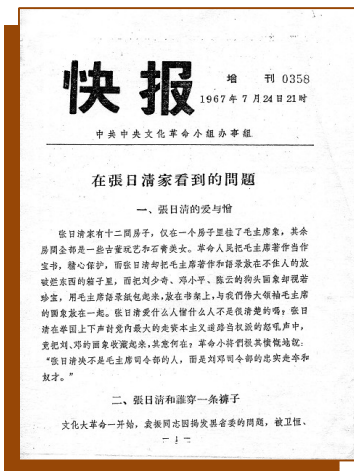
山西“一一二”夺权的功臣，非刘格平（山西省副省长）、张日清（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莫属。夺权后成立的山西省核心小组，由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1967年3月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又由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等任副主任。惟自1967年4月以后，核心小组产生重大分歧，刘格平等与张日清等各支持一派，为此，中央多次召集省核心小组成员等进京开会，

以解决山西问题。7月的会议，一边倒地倒向了刘格平一派，认为“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的批判和斗争”。7月中旬以后，太原部分群众组织冲击了山西省军区，张贴“打倒张日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甚至抄了张日清的家。8月14日，太原“揪军内走资派联络站”批斗了张日清。

《快报》1967年7月15日第3096号刊载的《派往山西记者遭到张日清等人刁难的情况》与7月24日增刊第0358号刊载的《在张日清家看到的问题》，无



疑等于是对批张火上浇油。



所幸张日清长期打而未倒。1967年5月，张日清被提为北京军区副政委（仍兼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当年12月，陆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谢振华增补为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并任新成立的省支左委员会主任，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任第二主任，张日清任第三主任。直到1969年7月，改组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会领导班子，方与刘格平等留在北京，“检查错误”。

北京军区政委副政委一职，保留至1971年4月。这是否反映了文革中多种力量的博弈，值得研究。

派往山西记者遭到张日清等人刁难的情况

五月以来，张日清、刘贯一、刘志兰以及“红联站”的一些负责人，对派往太原记者进行种种刁难，制造很多流言蜚语攻击排挤记者。如说：

“王志刚与丁磊等人开会策划炮轰刘志兰”，“王志刚叫丁磊汇报情况”，“王志刚已经表态支持‘红总站’”，“王志刚批评‘红总站’造反精神不强，要他们学习内蒙敢冲军区的精神；张日清是个政治大扒手，为什么不可以拉下马！”等等。张日清同志也公开说：“老王（王志刚）是倾向‘红总站’的，老吕（吕继周）是倾向‘红联站’的，老陆（陆咸辉）是和稀泥的。”这些话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给记者采访造成很大困难，最后发生六月十五日晚“红联站”等组织围攻记者的事件。

五月八日，“红联站”写了一个《关于‘四·一四’事件的初步调查》（这个调查已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这个报告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搞了很多歪曲事实以至捏造的材料。例如说：“四月十四日，宋捷、吴春永、杨承效、郝廷云（以上均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各革命组织的负

责人)、王志刚等人在丁磊家里开会,研究炮轰刘志兰的问题。”还说,“四月十五日在省军区召开座谈会,主要是谈形势,王志刚主持,有省军区两个负责人参加,没有发言,但实际上是主角。王志刚在会上说:‘在艰苦的时候,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等等。“红联站”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初步调查中对记者产生怀疑,是可以原谅的。但某些领导同志,也信以为真,在五月十八日下午省核心小组会上,刘贯一刁难地提出问题说:“还有王志刚,他与你们(指陆咸辉、吕继周)是什么关系,我们不便过问。反正他态度不端正,不是客观报道。”接着张日清竟赤裸裸地下了逐客令,说:“我主张,他明天就离开太原,不是我不欢迎他,是群众,他是参加这次策划炮轰刘志兰的。”刘志兰也气狠狠地表示,完全同意张、刘的意见。

六月中旬以后,核心小组工作基本瘫痪,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撂下工作先后搬进了军区,背着刘格平等同志不断召开秘密会议,单方面接见“红联站”及与“红联站”观点相同的各组织,给他们出谋划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指挥“红联站”和军训部队的黑司令部。他们的每一活动都背着记者。六月十六日晚,王志刚同志得知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顾蕊(刘贯一老婆)、李茵之(北京外语学院赴晋学生,是张日清最亲信的人,可以随便看张的材料,坐张的汽车)要开紧急会议,但记者一去,他们就不开会了。张日清说:“王志刚,咱们以后再谈吧,我们还有些事情。”当记者一走,他们就凑到一块开起会来。

六月二十日,王志刚去会议室,参加“红大刀”八个负责人向张日清、刘贯一的汇报会,记者一到,张日清就指着记者说:“他就是王志刚,《红旗》杂志记者。”“红大刀”的人一听,就七嘴八舌地往外撵记

者。张日清也说：“今天是他们向我汇报，我也是听他们意见的，你就不要参加了，以后再让他们给你谈一次。”这样，又把记者赶走。六月二十五日晚，王志刚得知军区主要负责人要开会，便在事先请示了副政委李佐玉，李表示欢迎记者参加。可是等张日清到会后，看见记者在，就说：“王志刚你不要参加了吧。今天开会不研究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只是把军队内部的问题谈一下，你不要参加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没有参加这次会。

在对待记者问题上，六十九军曹中南、谢振华二同志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在群众中散布了对记者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王志刚同志，他们经常采取迴避的态度。

（记者 陆咸辉 王志刚）

在张日清家看到的问题

一、张日清的爱与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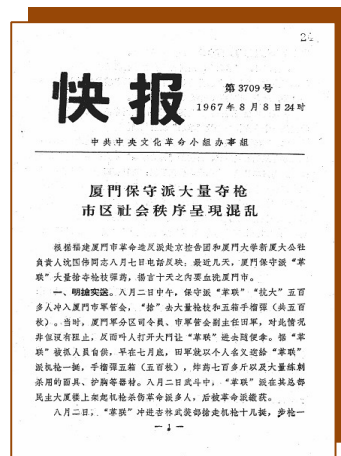
张日清家有十二间房子，仅在一个房子里挂了毛主席象，其余房间全部是一些古董玩艺和石膏美女。革命人民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宝书，精心保护，而张日清却把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放在不住人的放破烂东西的箱（房）子里，而把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狗头画像却视若珍宝，用毛主席语录纸包起来，放在书架上，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放在一起。张日清爱什么人憎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张日清在举国上下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怒吼声中，竟把刘、邓的画像收藏起来，其意何在？革命小将们极其愤慨地说：“张日清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是刘邓司令部的忠实走卒和奴才。”

.....

(记者 王志刚)

3、厦门：社会动态

1967年1月，福建形成了“革造会”与“八二九”两大派，厦门地区也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革联”、“促联”两大派。自4月以后，两派武斗愈演愈烈。为了稳定福建前线地区的局势，5月11日，中央宣布对福建省进行军事管制，由韩先楚等九人组成福建省军管会。6月18日，福州军区批准对厦门实行军事管制，由陆军第三十一军牵头，成立厦门市军管会，三十一军政委郑国任军管会主任，军参谋长田世兴任第一副主任，该军所辖陆军第九十三师政委李平、厦门军分区司令员田军任副主任。



厦门军管以后，局面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1967年7月26日，厦门开始大规模抢枪，8月2日在厦门大学、8月19日在厦门莲板发生大规模武斗，在此期间，部队机关被冲击，部队和民兵的武器弹药被大量抢夺。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及周边龙溪地区被抢各种枪支5507支，无后座力炮5门，六〇炮7门，八二迫击炮3门，手榴弹3843枚，各种枪弹93万发。厦门万寿岩国防仓库被抢走二十三卡车的弹药，两派武斗开枪开炮，伤数百人，亡百余人¹。

《快报》1967年8月8日24时第3709号刊载的《厦门保守派大量夺枪，市区社会秩序呈现混乱》一文，记者明显倾向“促联”一派。

厦门保守派大量夺枪 市区社会秩序呈现混乱

根据福建厦门市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和厦门大学新厦大公社负责人沈国伟同志八月七日电话反映；最近几天，厦门保守派“革联”

¹ 据《陆军第三十一军军史》，1979年12月，页437。

大量抢夺枪枝弹药，扬言十天之内要血洗厦门市。

一、**明抢实送。**八月二日中午，保守派“革联”“抗大”五百多人冲入厦门市军管会，“抢”去大量枪枝和五箱手榴弹（共五百枚）。当时，厦门军分区司令员、市军管会副主任田军，对此情况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叫人打开大门让“革联”进去随便拿。据“革联”被抓人员自供，早在七月底，田军就以个人名义送给“革联”派机枪一挺，手榴弹五箱（五百枚），炸药七百多斤以及大量练刺杀用的面具、护胸等器材。八月二日武斗中，“革联”派在其总部民主大厦楼上架起机枪杀伤革命派多人，后被革命派缴获。

八月二日，“革联”冲进杏林武装部抢走机枪十几挺，步枪一百多支和大量弹药。两名武装部长跳楼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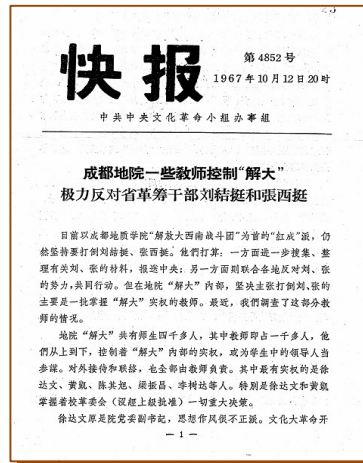
八月四日，“革联”冲进同安武装部抢去轻重机枪十几挺、步枪二百多支。武装部长跳井自杀。下午，又抢劫前线广播电台（军事机关，对台湾广播），拿走很多枪枝弹药。

据厦门市法庭庭长贾文贵同志反映：厦门市公安局二千支枪，检察院三十多支枪也都被“革联”派所控制。

二、**煽动农民进城参加械斗。**市军管会出动汽车运送“革联”派到市郊组织农民进城，公安局“公安革联”也全部下乡煽动农民进城。八月二日晚上有七卡车农民进城；四日有四卡车农民进城，晚上又有一百多农民进入市中心区，他们都带有武器、棍棒。从六月二日以后由驻军严密封锁的厦门海堤，八月二日突然解除封锁，为农民进城打开大门。“革联”派在厦门市郊海沧、前线公社、杏林、同安以及鼓浪屿等地建立据点，储备大量弹粮，形成对厦门市区的包围。同时，还调动海员、渔民上岸参加武斗。据悉郑成功文物馆也被“革联”占为

据点，文物部分被盗。

三、厦门市呈现混乱。最近几天夜间，厦门驻军头戴钢盔和公安局、“革联”派一起“演习”，信号是“促联”（革命派）来了。“革联”派成立“红卫兵军事审判委员会”，要审判革命领导干部、市委第二书记汪大铭同志。部队家属纷纷撤到农村，说是“要打仗了”。军管单位逐步撤销军管。公安、警察全部撤到农村，现在厦门市一片混乱。暗杀事件发生多起。商店关门，公共汽车和火车停开，杏林工业区停工。纺织厂、酒厂、罐头厂革命派被赶出门，工资停发。“革联”窃走厦门大学财务科公章，冻结厦门大学经费，四千多师生领不到工资，生活困难。



(记者 方锡金)

4、成都：群众组织动态

《快报》1967年10月21日第4852号，刊载了《成都地院一些教师控制“解大”，极力反对省革筹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一文。

“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其核心，应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与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三家。“红成”坚持要打倒的刘结挺（原宜宾地委第二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刘结挺之妻），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迫害干部”，1963年4月经中央批准被撤职，1965年3月被开除党籍。刘、张文革中翻案，“红成”本功不可没，后因刘、张支持更激进的“八二六”派，“红成”与之翻脸。自1967

年5月四川“红十条”公布之后，刘、张确实也风光过一阵子，两人同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其后刘相继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夫妻俩于1970年8月倒台，“挂起来，靠边站”，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从此未得翻身。历史地看，“红成”当年的坚持，还挺有远见的。

成都地院一些教师控制“解大”

极力反对省革筹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

目前以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团”为首的“红成”派，仍然坚持要打倒刘结挺、张西挺。他们打算：一方面进一步搜集、整理有关刘、张的材料，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则联合各地反对刘、张的势力，共同行动。但在地院“解大”内部，坚决主张打倒刘、张的主要是一批掌握“解大”实权的教师。最近，我们调查了这部分教师的情况。

地院“解大”共有师生四千多人，其中教师即占一千多人，他们从上到下，控制着“解大”内部的实权，或为学生中的领导人当参谋。对外接待和联络，也全部由教师负责。其中最有实权的是徐达文、黄凯、陈其旭、梁振昌、李树达等人。特别是徐达文和黄凯掌握着校革委会（没经上级批准）一切重大决策。

徐达文原是院党委副书记，思想作风很不正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原党委书记兼院长赵铎因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准备向全院师生作检查，徐对赵说：“你看不见这个来势吗？检查得再好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干脆领一帮人起来干算了！”以后，徐达文起来“造反”。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黄凯原是数理化系政治处主任，在运动中“造反”比较早，现在也是革委会副主任。黄对外联系面极广，然而在较大的场合，却又从来不肯抛头露面。去年十二月份，李井泉的老婆肖理要去北京告状，为“产业军”辩护，就是由黄凯和李亚希（地院数理化系主任兼代理总支书记）两个安排，让地院“解大”汽车队队长洪国华夫妇护送去北京的。

围绕在徐达文、黄凯等实权人物的周围，还有一个参谋班子，由陈其旭（三系政治处主任，现为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李亚希、裴元秀（政治教研室干部）等人组成。徐、黄及其参谋班子的意图与决策，多是通过人数较多的三系、找矿、石油等系去贯彻的。三系的行动由陈其旭及原总书记李洪兴支配，找矿系以原系主任李树达（国民党员）、教师戈定一（父亲是国民党校级军官）、谭金武（母亲是国民党特务）、刘炳常（国民党员）、刘宝君（三青团分队长）、曾允学等人为核心，组成“钢刀一支队”，左右着全系性的组织“钢刀战斗兵团”。石油系，是以原党总支书记梁振昌（现为革命会常委）为首的一群教师，左右着该系的行动。

在地院的教师队伍中，反对刘结挺、张西挺之所以如此强烈，大抵有三种原因：

一、受到李井泉欺骗宣传的影响，加之刘、张对待“红成”的态度有偏激情绪，长时期不到“红成”派去做工作，加深了对立情绪。

二、一小部分人对刘、张的提升不服气，有的企图利用学生中小资产阶级派性，以“左”的面目登场，自己好蒙混过关。原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杨正德（老红军，现任革命会常委）经常在“解大”内骂刘、张：“过去那副狼狈样，象个囚徒。他算个啥东西，现在居然做了成

都军区副政委！草寇做了皇帝，还会知道天高地厚？”又说：“我的意见是非打倒刘结挺不可！我早就准备坐牢了，坐牢可以吃饭不拿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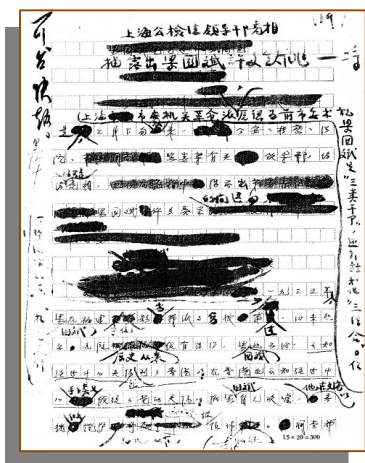
三、可能有极个别的坏人与李、廖死党有联系。

(记者 廖惠如 周始建)

五、《快报》编辑过程例一

根据现有材料，以《快报》1967年4月8日20时第1795号刊载的《上海公检法领导干部亮相，揭露出梁国斌许多重大问题》为例，将《快报》编辑过程简述如下。

1967年4月6日，记者站收到记者郑晓枫以航空邮件方式寄自上海的文稿，题目是“梁国斌究竟是什么角色现在还看不清楚——新近揭出来的梁的几个重要问题”。



梁国斌（1910-1980），时为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福建长汀人，1929年加入中共。建国前曾历任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部长、保卫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5年调上海，分管政法工作。

1968年2月被秘密关押在北京，长达七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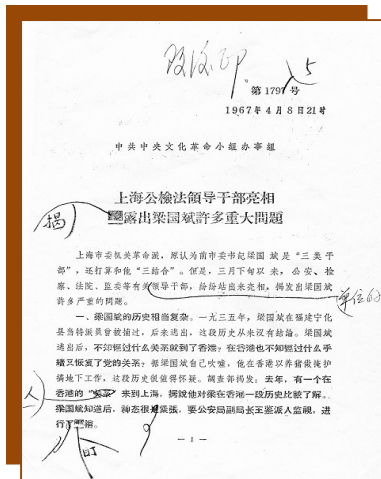
记者站通联组收到该稿件后，进行了来稿登记，并批示：“可发快报”。

编辑组将标题改为“上海公检法领导干部亮相，揭露出梁国斌许多重大问题”，并对内文进行了大量删改。

原稿首段为：“自三月下旬以来，上海市公安、检察、法院、市委调查部、监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亮相，他们在亮相中，揭发出市委书记（管政法工作）梁国斌的许多严重错误，现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摘要报告。”

编辑组在原稿上将首段改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派，原认为前市委书记梁国斌是‘三类干部’，还打算和他‘三结合’。但是，三月下旬以来，公安、检察、法院、监委等有关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揭发出梁国斌许多严重的问题。”在校样上，在“有关领导干部”中间，又加上“单位的”三字，变为“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

原稿有“梁在历史上有两个重大疑点”，编辑将其删去。第二段开头“关于梁被捕和在香港的问题”一句，编辑改为黑体字“一、梁国斌的历史相当复杂”。



第四段原稿开头为“梁可能是饶漱石集团的漏网分子”，编辑改为黑体字“二、梁国斌很可能是饶漱石集团漏网分子”。

原稿中有两段“杨帆¹在解放后搞的那一套特务活动，饶和梁都是清楚的，据说饶、梁还参与了杨帆以特务反特务计划的制定”，“华东公安部副部长李世英对于杨帆以特反特的活动，是进行过斗争

的，当时梁在华东公安部里，排挤李士英，最后，将李挤走”，编辑均将其删去。

原稿中“杨帆的问题，早在42年就揭发过一次”，编辑自以为是地将“42年”改为“四十二军”，变为“杨帆的问题早在四十二军就揭发过”，与记者原意不合，与史实更不合。

原稿中最后几段，编辑全部删除。这几段是：

“是谁把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底，洩给罗瑞卿的。

¹ 应为扬帆，下同。

陈丕显自己讲，在姚文发表后的不几天，罗来上海，罗问及此文，便将写的过程、背景，包括主席的指示，告诉了罗。陈向记者说，‘我和罗谈以前，公安部门就给讲出来了，罗下飞机后，就问公安局长王鉴姚文的情况，王鉴就告诉了。’记者问梁国斌王鉴何以得知书记处讨论姚文的情况，梁支吾谈不出所以然。王鉴和罗在机场上谈了姚的文章后，曾经和梁说过，‘他抢先把姚文告诉了罗’，梁说‘谈不上抢先’。因此，是谁把姚文的底洩给罗，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对于梁国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同志认识上，也是有过变化，他们原来认为梁的问题可以按三类干部处理，还准备实行三结合。自从月底揭发了梁的

一些政治上问题后，向记者说，现在我们又没有数了，还得再挖挖梁的问题。

“梁国斌在最近表现，一方面表示承认错误，表示检讨，但对于前述的那些问题，又很躲躲闪闪，怕算老帐。一方面表示要坚决地和刘、邓、彭、罗、陈、曹划清界线，对陈、曹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梁国斌究竟是什么角色，还要再表演才能看得清，现在去搞三结合，时间还早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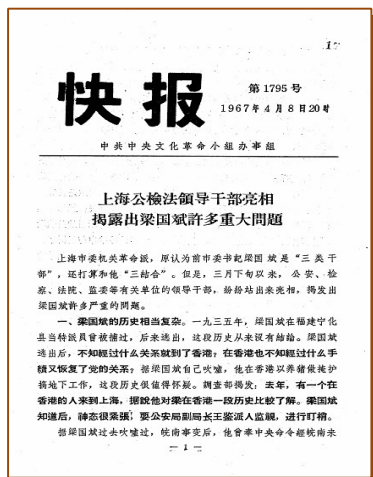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快报》刊出的定稿，与记者原稿有颇大出入。在稿件处理上，《快报》通联组有筛选权，在文字处理上，《快报》编辑组有最后决定权。记者稿件中的疑问句，往往变为了定稿中的肯定句，定稿中的文字，不少掺杂了编辑的思维而不一定是记者的原意（当然记者与编辑的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以下为4月8日20时《快报》第1795号刊载的改定后的全文——

上海公检法领导干部亮相

揭露出梁国斌许多重大问题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派，原认为前市委书记梁国斌是“三类干部”，



还打算和他“三结合”。但是，三月下旬以来，公安、检察、法院、监委等有关单位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揭发出梁国斌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梁国斌的历史相当复杂。一九三五年，梁国斌在福建宁化县当特派员曾被捕过，后来逃出，这段历史从来没有结论。梁国斌逃出后，不知经过什么关系就到了香港？在香港也不知经过什么手续又恢复了党的关系？据梁国斌自己吹嘘，他在香港以养猪做掩护搞地下工作，这段历史很值得怀疑。调查部揭发：**去年，有一个在香港的人来到上海，据说他对梁在香港一段历史比较了解。梁国斌知道后，神态很紧张，要公安局副局长王鉴派人监视，进行盯梢。**

据梁国斌过去吹嘘过，皖南事变后，他曾奉中央命令经皖南来上海。途中，在安徽芜湖街上，碰见了一个相识的叛徒，是日本人的特务。他用酒把这个叛徒灌醉后，才“幸然摆脱”，这件事也很值得怀疑。

二、梁国斌很可能是饶漱石集团漏网分子。据说，他过去与饶漱石、潘汉年和杨帆的关系极为密切。高饶反党集团和潘、杨特务案件揭发后，梁国斌当时没有揭过什么问题，借口有病，跑到青岛去休养了，实际上他是去躲风。

据揭发，杨帆的问题早在四十二军¹就揭发过。当时，饶漱石是华中局副书记，梁国斌是新四军保卫部副部长，亲自审查过杨帆的问题。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杨帆的这段历史，梁国斌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在解放后杨帆得到重用，当上了上海公安局长？**梁国斌很有伙同饶漱石包庇了杨帆的嫌疑。**当时，就有人认为梁国斌是饶漱石集团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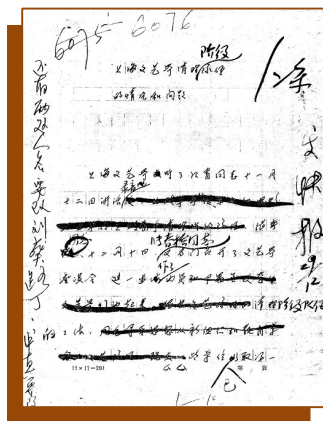
¹ 应为 42 年。

不知后来他在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却漏网了。

三、刘少奇为什么对梁国斌这么亲热？据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对梁来往就超过了一般上下级的关系。当时，梁国斌在淮南鲁西任军法处长时，当时新四军军部也住在这里，梁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还常给刘少奇送礼，拉拉扯扯。一九五〇年，梁国斌在福建任公安厅厅长，中央正在布置镇反工作，正式通知尚未下达，刘少奇就给梁国斌写了一封信来，告诉他：“镇反即将开始，要争取立功。”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间，刘两次带梁到湖南“蹲点”。后来，据说是由刘少奇把梁国斌调到贵州任省委书记，控制了那里的“四清”运动。

四、梁国斌和罗瑞卿的关系也极不正常。过去梁国斌经常吹捧罗瑞卿，但罗的问题揭出后，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什么：“罗的问题是到军队后才揭发的，我在公安部是受罗打击的，受排挤的，我在高松的错误也是罗瑞卿整我的。”

据揭发，一九六五年年底，中央上海会议进行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梁国斌担任会议的保卫工作。他利用工作方便，窃听了会议的内容，并透露给当时在上海休养的王仲方（罗的前任秘书）、汪金祥（公安部副部长）和王昭（原任公安部副部长，后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这三个人皆是罗瑞卿的亲信。据梁交代，他在会议结束后，还送给他们看中央关于罗瑞卿问题的紧急通知的电报（现在说法不一，尚需查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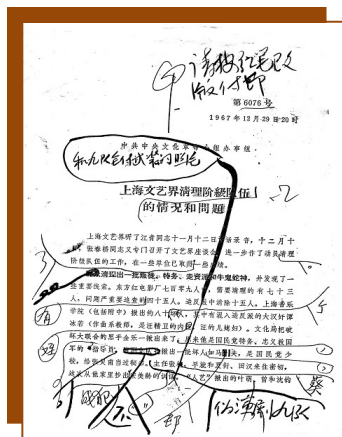


在会议期间，据说罗瑞卿还给陈丕显和梁国斌打过电话。会议结

束后，陈丕显夫妇宴送¹罗瑞卿夫妇，梁国斌也到场陪客。据警卫员揭发，在席间，罗、陈、梁三人曾在另一个密室里谈话。

(记者 郑晓枫)

六、《快报》编辑过程例二



1967年12月29日凌晨一时，驻上海记者组记者蒋宝琪电话发稿，题为“上海文艺界清理队伍的情况和问题”，由通联组王录珍等接收。通联组并批示：“编发29/12”，“发快报29/12”。

来电记录稿原标题，编辑加了“阶段”二字，改为“上海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和问题”。

来电记录稿首段为：“上海文艺界在听了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后，上戏革命楼、东方红电影厂等单位立刻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张春桥在十二月十日，又专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进一步作动员和部署至使整个文艺界行动起来，狠抓文艺队伍的清理工作，用毛泽东思想从新组织和教育革命的文艺队伍，现在一些单位以取得一些成绩。”

编辑在来电记录稿上改为：“上海文艺界听了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录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同志又专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进一步作了动员。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一些单位已取得一些成绩”。后又在校样“已取得一些成绩”中加了一个“了”字，成为定稿。

来电记录稿第二段为：“一、清理队伍的情况。一些单位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积极投入清理队伍的斗争，清理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清除了一些混入造反派内部的坏人。东方红电影厂（全厂七百零九人）经研究，需要清理的七十三人，问题严重要追查的四十五人，从造反派中清出十五人。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现揪出坏蛋约八十人，其中有混入造反

¹ 应为宴送。

派的大汉奸谭冰若（作曲系教师，是汪精卫的内姪¹，汪的儿媳妇又是他的姐姐）。

记录稿另一段（不是第三段）为：“这次清理已经取得一些成绩。文化局把破坏大联合的黑手金乐一揪出来，原来他是国民党特务，‘忠义救国军’的指导员，演剧九队马邨夫给张灵甫当过秘书，国民党少校军官。演剧九队的主任张槐早就和夏衍、田翰来往密切，这次从他家抄出演剧九队全付武装的照片、宋美龄的训话等。‘人艺’揪出了叶荫，曾和沈钧儒在南京一道参加过CC特务组织。红旗电影厂揪出混入造反派政宣组的仲星火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看守。工艺美术学校揪出女黑画家孙吾英是国民党头子陈果夫的老婆，此人改嫁了三次，最后一个男人还是个黑帮。东方红电影厂还查出了一个同上海‘龚品梅’国际间谍事件有关系的人，叫曹玉光，他知道联络暗号，并看过收发报机。他们还对‘上影’的老班底伪‘华影’、‘中直’‘中电’反动历史罪恶活动、组成人员及后台老板等作了一些调查。‘人艺’发现剧团中有些人参加过‘戡乱救国大队’情况复杂，涉及到二十六个剧种、大队，和潘汉年、夏衍等关系密切。”

编辑在电话记录稿上将两段合并为一段，改为：

“群众清理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东方红电影厂七百零九人中，需要清理的有七十三人，问题严重重要追查的四十五人，造反派中清除十五人。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揪出约八十坏人，其中有混入造反派的大汉奸谭冰若（作曲系教师，是汪精卫的内姪²，汪的儿媳妇）³。文化局把破坏大联合的黑手金乐一揪出



¹ 应为内姪。

² 应为内姪。

³ 不知为什么编辑将“儿媳”后的“又是他的姐姐”六字删去了，完全改变了此句话的原意。

来了。原来他是国民党特务，‘忠义救国军’的指导员。……‘人艺’发现剧团中有些人参加过‘戡乱救国大队’，和潘汉年，夏衍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

编辑经在记录稿、校样上两次大修改，成为定稿。在最后的定稿中，谭冰若一大男子变为了“汪精卫的内侄女，汪的儿媳妇”。

《上海文艺界清理阶段队伍的情况和问题》于12月29日20时刊载于《快报》第6076号。编发时间距稿件抄收时间不足20小时。定稿后的全文如下。

上海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和问题

上海文艺界听了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录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同志又专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进一步作了动员。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一些单位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清理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东方红电影厂七二零九人中，需要清理的有七十三人，问题严重要追查的有四十五人。选反派中清除十五人。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揪出约八十个坏人，其中有混入造反派的大汉奸谭冰若（作曲系教师，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内侄女，汪的儿媳妇）。文化局把破坏大联合的黑手金乐一揪出来了，他原是国民党特务、忠义救国军的指导员，还揪出一批坏人，如马邨夫，是国民党少校，给张灵甫当过秘书。张葵，是伪演剧九队主任，早就和夏衍、田汉来往密切，这次从他家里抄出战犯宋美龄的“训话”。“人艺”揪出的叶萌，曾和沈钧儒在南京一道参加过CC特务组织。红旗电影厂揪出的混入造反派政宣组的仲星火，原来是中美合作所的看守。工艺美术学校揪出的女黑画家孙吾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的老婆。此人三次改嫁，最后一个男人还是个黑帮。东方红电影厂查出曹玉光

和龚品梅国际间谍案件有关。他知道联络暗号，并看过收发报机。革命群众还对“上影”的老班底伪中华电影制片厂、伪中央电影摄影厂的人员及后台作了一些调查。“人艺”发现剧团中有些人参加过“戡乱救国大队”，和潘汉年、夏衍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

但是，运动进展不平衡。一部分单位群众发动较好，多数单位正在发动，有些单位至今未动。保守势力还相当大，阶级敌人也在顽抗。东方红电影厂、上海人艺行动较快，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大批判开展得好，专案工作也抓得紧。东方红电影厂还注意把人员、班子、黑线联系起来进行清理。上海京剧院大联合没搞好，虽然斗争了几次周信芳，但没有认真清理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仲林）线上的人物。上海青年话剧团认为“老头子”不多，须清理的少，因此反应不太大。实验管弦乐团也不重视清理工作。上海戏曲学校和越剧院两派仍然忙于武斗，没有精力抓清理工作。

据了解，在清理工作中目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一、有些单位有右倾情绪。有的以为搞了一年多，没有啥可清了。歌剧院勤务组有人认为，该院“封建遗老”没有，反动艺术“权威”很少，三十年代人物不多，敌特反坏活动余地很小。甚至对混入勤务组的两个三青团员也没有清除出去。

二、没有很好地解决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许多单位反映：他们清理队伍，主要依靠青年、学员、舞台美工人员，因而力量单薄。文化局一百一十六人中，只有七八个青年。京剧院四百五十九人中，也只有五十多个青年。即使在青年较多的地方，如歌剧院等单位，也由于部分青年曾经站错了队等原因，至今不敢站起来，许多单位对年纪大的人又不敢使用，全部靠边，加之文艺界旧势力又相当强，

因此，在清理队伍中迫切需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

三、有些单位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尤其是中小型剧团较突出。据反映，新华京剧团造反派的几个头头，有的是封建把头，有的是宪兵，有的是三青团员。黄浦京剧团造反派第一把手周正邦，其父是国民党财政部秘书处长、战犯宋美龄的家庭教师。本人是国民党少校军官，又是《海瑞》和《李秀成》等大毒草的编导。在这些人控制下阶级斗争盖子至今揭不开。

四、派性斗争、裙带关系、帮派势力掩盖了阶级斗争。如戏曲学校有许多俞振飞班底的人没有揪，而互相揪年轻人。黄浦京戏团一派揪坏头头，一派说我们保定了。

阶级敌人动向。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后，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很紧张，斗争开始白热化，初步反映有以下动向：

一、自杀抗拒。十多天来，自杀案件近十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是国民党少校，伪演剧九队骨干最近揭发“励志社”问题时，高自杀。红旗电影厂的关宏达、陈天国、葛颂琪（未死），电影技术厂右派陈瑞和（未死）、电影局特嫌分子陈劲君，少儿社柯青（国民党上尉）等人也于最近自杀，抗拒清理。

二、逃避批判。有些混进造反派的坏人“自动”退出，企图溜走，逃避批判斗争。更为严重的是，有人企图叛国。如工农兵电影厂摄影师反动艺术“权威”王明之逃到昆明，准备偷越国境（已逮捕）。

三、猖狂反扑。有的拒不认帐，有的恶毒攻击清理队伍是“打击一大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左实右”。文化局走资派路丁被斗后，他的老婆章博北上“告状”。临行前，她写了一首反动诗：

“别临上海剑穿胸，长恨绵绵手缺弓，此番若是得志归，誓将狗血祭长空。”路丁的儿子（在京剧院）也恶毒地攻击清理队伍是“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自上而下复辟”。另据“人艺”反映：一些牛鬼蛇神还秘密串联，搞了一个“牛（鬼蛇神）联站”，蒙蔽一些青年为他们服务，现正追查。

四、感到绝望。赵丹的老婆黄宗英说：“我已经绝望了，没有话讲了。”导演谢晋说：“我当导演有分析能力，你们不打我们，打什么呢？我感到这一次是我们阶级的复没，谁也跑不了。”

（记者 蒋宝琪）

通过上述事例（此外还有不少因篇幅关系未能收入本文的《快报》编辑过程案例），总体上我们可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采编活动，是服务于中央文革小组所执行的文革极左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记者站记者所反映、上报的各地动态，普遍带有记者本人主观的、强烈的倾向性，而并非是纯客观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记者既有的倾向性加上身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内受到极左思潮熏陶更深的编辑们的加工改动，使情报资料的倾向性更为明显。而记者、编辑的这种倾向性，是情报资料的那几位位高权重的受众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所喜闻乐见的，是合符他们的口味的。起码，至今我们从未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至当时在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些情报有什么截然不同的批评性意见。

毋庸置疑，记者站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主观上都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都是积极做好工作的。不少记者在全国各地激烈的夺权、武斗风潮中，确实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一线，任劳任怨，以了解所谓“第一手材料”，及时上报。但是，他们归根结底是在一条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极左的错误路线之下为之服务，他们越努力，其实不过就是为这条错误路线提供更多的弹药而已。故而，笔者不得不认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切所作所为，应该而且必须同文化大革命

一样一并加以彻底否定。

2012年3月

【评论】

浩然与《金光大道》

啟之



《金光大道》改编自浩然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前两部各地前后印了六百万册，还被译成日、英以及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其影响之大，仅次于样板戏。“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借着小说的传播，电影《金光大道》更是红极一时。

按照长影原来的计划，《金光大道》要拍上中下三集。上集从1950年土改写到互助组，中集从互助组写到1955年成立合作社，下集从合作社写到人民公社。

（六十年代的浩然）有了这三部曲，主流话语所描绘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就会完整地呈现于银幕。五十年代初拍摄的《土地》留下的遗憾就会得到弥补，郭小川、水华等一班人马未竟的事业，就会在浩然、肖伊宪、林农、孙羽等人手中完成。¹

计划赶不上变化。当下集的剧本审查通过，电影正要上马的时候，“四人帮”被抓，浩然挨批，长影下令缓拍。剧组很多人都流了泪。导演孙羽还发了狠话：如果这个戏停拍的话，以后不拍片了。然而，下集还是永远地停了。²

在八九十年代，浩然曾两次遭到舆论界的批评，这部电影也在挨批之列。文

¹ 1953年，为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中共中央责成电影局拍摄关于土改与合作化的影片《土地》。郭小川、张水华等人苦干经年，剧本七审八审一再修改。还是没有通过。详见孟犁野，《〈土地〉的得失与水华主体意识的觉醒》，《电影艺术》1987年，第7期。郭晓蕙：《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² 肖伊宪：《创作回顾一：金光大道》，《电影剧作笔记》
<http://zonghe.17xie.com/book/10000155/2623.htm>

艺界以新时期的农村改革为根据，声讨浩然和他的作品，批评他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为农民写作，而是为党写作。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为这场批评下了政治结论：“批浩然表面是对作品，实际是对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否定……邓小平同志主持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党 17 年的工作已有了科学而准确的评价和结论。”¹ 这一表态有效地制止了对浩然的讨伐。

浩然在 80 年代写了长篇小说《苍生》，这部小说与他以前写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情地主、揭露村干部的腐败，歌颂承包和分田。但是，他仍旧认为以前的作品是真实的。²与《艳阳天》相比，他更喜欢《金光大道》。他认为，这部小说完成了他给中国农村写史，给农民立传的宏伟心愿。³

1、土改与“狼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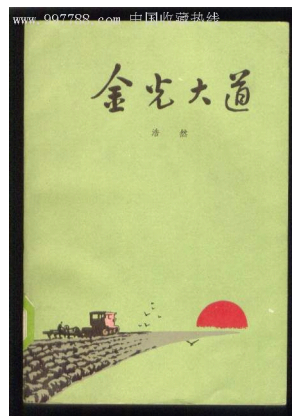
《金光大道》是什么史什么传，这里不好遽下断言。但是它至少也可以算做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论点是，土改之后，农村将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结论是，只有合作化才能共同富裕。论据是影片讲的故事。故事里的正反两个人物，一是高大泉，芳草地的党支书，一个健壮，阳光，一心向党又一心为乡亲们着想的青年农民。二是高的死对头，芳草地的村长张金发，一个瘦高、阴险、以党票做掩护，一心想发家的中年汉子。

影片从一场争论开始——

村公所前，富裕中农冯少怀炫耀刚买来的骡子，引起了翻身户的不满。张金发乘机宣讲：“在旧社会的时候，咱们穷人想发家，在苦洼子里扑腾了一辈子，到了还是一场空。眼下呐，咱们分了房子分了地，正是乘水合泥的好时候。他买了一头骡子，咱们买一匹马。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咱们大家伙儿就得长上这股子志气！”

高大泉质问道：“你问问大伙，翻身户有几家能买得起马？”

人们呼应着高大泉，张村长被噎了回去。



¹ 《管桦对“争议浩然”现象的一点看法》，《名家》1999年，第6期。

²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39。

³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239。

高大泉接着问道：“发家致富到底对谁的心思，有发的就有败的，翻了半截的身子都要翻回去。”

张村长说不出一句话。

高大泉说的不错，翻身户买不起牲口——土改只给了他们土地，并没有给他们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天灾人祸、生病多子、好吃懒做、贪杯赌博都足以使他们“翻了半截的身子再翻回去。”

刘祥的故事最能说明生病多子、劳力缺乏的后果。刘祥家里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女娃不过十来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老婆是个病号，屋里屋外全靠刘祥一人。家底薄、劳力少，为了给老婆抓药，不得不卖口粮。一家六口没有吃的，只好到天门镇沈记粮店赊了二百斤玉米。为了还这二百斤玉米，刘以小米二百斤，玉米四百斤的代价向秦富出售自家的房基地。如果不是高大泉出面阻止，刘祥就会成为芳草地第一个重新沦为赤贫的翻身户。

张金寿是另一种典型。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看见冯少怀买了骡子，他羡慕地说：“如今，你那院子里又是骡子又是猪呀，我呢，除了墙洞里的耗子，没有带毛的了。”没有牲口可以说穷，没有猪则是他懒。他人到中年，连老婆也娶不上。土改给他分了半挂大车，他换了二百斤小米买酒喝。土改前，这种人受穷；土改后，这种人照样受穷。是他自己把翻了半截的身子又翻了回去。

这两种人物在《槐树庄》（八一，1962，王莘导演）和《箭杆河边》（北影，1964）里早就有了。《槐树庄》里面的李老康跟刘祥一样，也是因为老婆病，孩子多，劳力少。不得不把刚分到手的四亩好地，卖给中农李满仓。《箭杆河边》中的二赖子跟张金寿一样，也是好吃懒做，娶不上老婆。

这两种人物给土改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土地的集中有多种原因，那么就应该承认，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或是祖上留下来的，或是苦干出来的；或是经营工商业置办的，或是穷人押债而来的。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守住地，除了劳力多、无病号、风调雨顺之外，还得勤俭持家。

浩然对此是心知肚明的。《苍生》里面的田大妈的娘家，就是个这样的土财主，“住着红砖到顶的大瓦房，种着旱涝保收的水浇地，拴着双套的铁轴车，雇着两个扛活的。那日子真是粮满仓，钱满箱，肥得冒油，别看这么富，一家老小谁都没有享过福。田大妈的爹当家理事，固执地按照他家祖传的规矩过日子，克

勤克俭，节衣缩食，丰年防歉这些古训是他的虔诚的信条。他从来舍不得往自己身上穿一件细布衣服，全靠土织土纺的粗小布换季。除了逢年过节，没有动过荤腥。全家人一日三餐都跟扛活的一个桌子上吞咽糠菜两掺合的饭食。”

既然如此，《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道理何在？没收那些守法地主的财产的道理何在？

《暴风骤雨》（北影，1961年，谢铁骊导演）从法律的角度解答了这个问题——元茂屯的地主韩老六，欺压百姓，强奸民女，勾结蒋匪，手里还有数条人命。影片告诉人们：这样恶贯满盈地主应该枪毙，其土地财产应该分给穷人。

《槐树庄》从道德角度解答这个问题——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做了两件为富不仁的事，一是他在大年下赶走了郭大娘一家，二是迫使李老康以地抵债。影片告诉人们，即使崔老昆的儿子是中共干部，即使他积极抗日，他家的土地浮财也得瓜分。

理由很充足：剥削。郭大娘正告崔老昆：“你吃的穿的都是哪儿来的？我们农民身上的肉，不能长在你们地主身上！”郭大娘的说法来自上面的宣传。而这一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关于剥削的权威说法，不过是马克思抽去了现实条件，“纯然是建立在假定上”的学说。¹ 西方经济学家早就从理论上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致命错误：“只强调社会因素，丢开了自然因素；只强调价值，丢开了使用价值；特别是只强调劳动的生产性，丢开了资本的生产性。”²

当过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的于洋承认，他一开始也想不通：地主不是也参加劳动了吗？凭什么说他剥削呢？这个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马克思用“劳动价值学说”予以说明。当苏联解体，东欧“颜色革命”之后，人们想起了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斯坦的分析：“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³ “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 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

¹ 乔安·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言，转引自王亚男：《资本论研究》上海人民，1973，页346。王亚男在批判罗宾逊的时候，没有说理，只有扣帽子——她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她不但了解马克思所应用的方法，也全不了解他的整个体系。

²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拉彻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说法。转引自王亚男《资本论研究》，与对待罗宾逊一样，王亚男对这种说法的批判同样的扣帽子。页354。

³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1965，页97。

西。”¹ 尽管刘少奇也是马克思的好学生，但他还比较务实，且多少知道一点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所以，他用很极端的语言，告诉那些急于消灭新的两极分化的干部：“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² 他的意思是，“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³

三十年后，睁开眼睛看世界，人们豁然发现，靠剥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竟然成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于是，这边厢下了文件，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雇工。但是，问题来了，土改以剥削为由来剥夺守法地主的财产，讲得通吗？

与理不通，就要编造阶级斗争的神话：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地富反坏右一定会勾结党内外坏人搞破坏。按照这种逻辑，《金光大道》设计了一个范克明（谐音“反革命”），他给张金发出谋划策，（湖南农村土改。任冬林提供）让张也成立一个互助组，专拉那些腰粗腿壮，有牲口的人，跟高大泉对着干。他给



“沈记粮店”通风报信，教唆不法粮商沈义仁钻政策的空子。他暗地里锯断了送粮车的车轴，想害死高大泉。他狗急跳墙，杀了“滚刀肉”张金寿。他为什么如此仇恨这个制度呢？外调结果告诉我们：他是逃亡地主。

这是人们熟悉的阶级斗争公式。编导的高明之处在于，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影片的最后，一个俯拍镜头：张金发、沈义仁、冯少怀、范克明在昏暗的汽灯下商量如何对付统购统销。

张金发：“粮食在我手里，我就是不卖！”

范克明冷笑着站起来：“不卖？这是命令，命令就绝对得卖！”

张金发：“我一口咬定没有，他还敢翻？”

范克明讥讽地反问：“当年你怎么翻歪嘴子，抢他的浮财？”

张金发：“那是土改。”

范克明：“对呀，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的是一化三改造。改造谁呀，就是朝你们下家伙。”

¹ 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1965，页97。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63。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56。

这个问答之中，包含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在张金发看来，土改是革命，是造反，是穷人的盛大节日。它无法无天，可以闯进地富家去翻去抢，可以把人打死而逍遥法外。观众们认为这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从电影中知道，这些人不是黄世仁，就是韩老六。个个恶贯满盈，人人死有余辜。

浩然是土改的亲历者，但是他直到老年卧病，才道出了小说和影片之外的残暴和不义：他十三四岁的时候，想到唐山学手艺，走到林南仓实在走不动了，一位好心的白大叔留他住下。这个白大叔家境富裕，开一个肉铺，有五十多亩地，两头牲口，一挂大车，雇了一个长工，忙时还雇些短工。¹白大叔有个独生女玉儿，想招他做进门女婿。土改时，差点儿做了他的岳父的白大叔成了反革命，白大婶和玉儿逃到了北京。他得知这一消息，心里别扭，无法将这一家子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报纸上的文章和上边工作人员的演讲，曾经在我耳朵里灌输了许多有关地主老财搞压迫、搞剥削、喝人血、害性命的邪恶事例。所有这些我都不仅相信，而且激起过无数次的愤怒之火，烧得我想跳起来跟那班恶人去拼杀。可惜，这些在白大叔一家人身上全然失去效力，激不起一点我对他们的仇恨。相反，我倒觉得白大叔一家都是好人，斗争他们是好人受了冤屈。”²

他把这些活思想告诉了他的革命引路人，副区长黎明。黎明“却说他被剥削阶级拉拢人的手段给骗了。”³

几个月后，这位与剥削阶级势不两立的黎副区长，被贫下中农“镐把炖肉”了——他出身地主，他老家闹土改，让他回去。县里让他骑马回乡，快去快回。他刚到村口就让贫农团从马上拽下来，一顿镐，就把他打死了。⁴杀人者的理由是：“他小子是喝我们穷人的血长大的。活该！对剥削阶级就得彻底清算，你死我活，誓不两立。”⁵当时这种死法很普遍，“刘吉素大财主多，一场减租减息打死了好几个人。”⁶

时任村干部的浩然也差点死在贫农团手里——土改工作队宣布以前的村干部是挡道的石头，贫农团冲进他家，不由分说，把他和他媳妇一起捆了，扔到黑

¹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63。

²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71。

³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71。

⁴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18。

⁵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19。

⁶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74。

屋里，准备“明天搞把炖肉”。多亏他的岳父，一位当地的老革命救了他们。¹

大概因为担负了“土改教科书”的任务，电影《暴风骤雨》没有像小说那样表现暴民打人杀人的血腥。画面上只是汹涌的人群、狂怒的表情和树林般的拳头。影片对韩老六的死，处理得既守法又含蓄：一张盖了政府大印的布告贴在了墙上，暗示了他末日。

六十年后，两位独立制片人采访了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描写的那个元茂屯（原名元宝屯），拍摄了另一部《暴风骤雨》（China Memo Films, 2005年）。这是一部纪录片，当年的和土改队员和亲历了土改的村民们对着摄像机讲述了土改的另一面：当时毙人不看罪行，只看成分。工作队听群众的，群众喊毙了，拉出就毙了。村与村之间，屯与屯之间，展开了杀人比赛，你杀四个，我就杀五个。比赛的结果：元宝屯和元兴屯共700户人家，被枪毙了73人，平均每十户就有一人被杀。这部片子还公布了几个数字：当时尚志县总户数为32,988户，人口118,587人，在土改斗争中，被斗总户数为5,070户，占总户数的15.4%，被斗人口为21,756人，占总人口的18.5%。因土改而死的共689人，其中自杀69人，打死273人（含打后死），枪毙333人。

在这部的纪录片中，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讲述了暴民的心理和山西的土改：“农民真正起来以后，他拼命啊。为什么拼命呢？一是受剥削，另一个是他怕地主报复。扛着镢头去刨人呀……长治地区打死的地主不在一百二百的。黎城有一天晚上就打死了一百个人。当时听到刘少奇在晋察冀那边开土地会议，刘少奇讲，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们杀死他二十个人……那时候，黎城的土改已经完成了，把留下的地主一下子全赶出去（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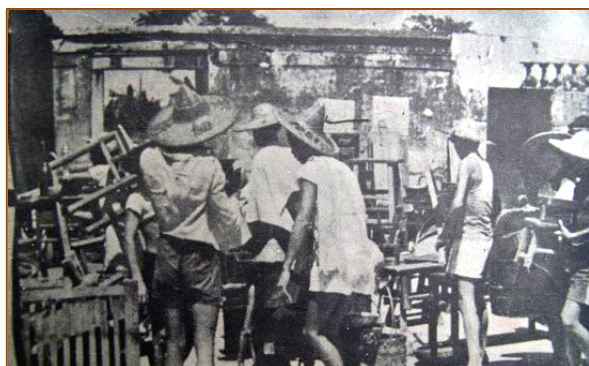
《金光大道》提到了地主歪嘴子的罪恶，提到了分他的土地财产，但没有提到他的下场。有《暴风骤雨》这本教科书，它即使提到，也不会违反政策。做过土改工作组副组长的于洋承认，土改时，按政策不可以打人，不过，打了也就打了。对暴民的拼命劲头深有体会的王谦，说土改工作组当时的两难——既要发动群众去抢去斗，又要让他们不搞暴力，是不可能的。元宝屯村民刘福清老人，对这事很看得开：“在那种情况下，告不了状，伸不了冤。一场风暴，能不死人吗？”

《金光大道》没有描写张金发在土改中的表现，只是从他的自我介绍中知道，

¹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19。

他当时是个积极分子。这自我评价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当时的张金发跟《暴风骤雨》中的赵光腚、郭孩儿，《槐树庄》里的刘老根、郭大娘一样，也是一个理直气壮地向剥削阶级斗争的勇士。其二是，他也是如浩然和上述纪录片中所说的那些暴民一样，是一位热衷于“镐把炖肉”和“拉出去毙了”的贫农团之一员。事过境迁，当张金发入了党，分了地，分了房，有了牲口，有了粮，当了村长之后，他就要强调秩序，注重人权了。这时候，闯民宅，翻私产，就是犯法。而在范克明看来，既然你以不讲理为原则，那么，你今天跟我不讲理，他明天就会跟你不讲理。你今天抄了我的家，明天就有人抄你的家。

范克明的这个“反革命”的恶毒诅咒，似乎在十几年后的浩劫中应验了——



抄家、批斗、打人、群专、滥杀、死无葬身之地……

被剥夺、被侮辱、被杀害的范围在这场革命中被无限地放大了，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五·一六分子、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组织……。这些人中包括歌颂土改的周立波、于洋，包括当年土改积极分子，包括那些投身土改的干部，包括土改政策的最高制订者刘少奇。

浩劫之后，人们追问“狼奶”教育。那么“狼奶”的成分中是否有当年的土改？具体言之，无视私有财产（土改中，农民分地主家的浮财，任冬林提供）观念的红卫兵与暴力土改时的分浮财有无精神联系？无视人权，打死师长的学生们与贫农团的“镐把炖肉”是否同一血缘？

《金光大道》的所有叙事，都是建立在土改的正义性之上的。如果你知道，林彪进东北时仅有十万人，土改后，穷人为了“保护胜利果实”而踊跃参军，至使林虎的部队在三年后达到83万（包括15万支前的民工）。你会怎么读解这部影片？如果你知道，实现高大泉念念不忘的“共同富裕”，除了“武装土改”之外，还有和平土改。如台湾那样“贯彻‘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方针，采取和平、渐进的方法，先征收地主保留额以外的耕地放领给农民，然后以协议购买方式由政府贷款予农民，并让农民购买地主保留额内的土地，以达到全面实现

耕者有其田的目的。”¹而这种土改使台湾早大陆二十年走向了经济腾飞，你又该怎么读解这部影片？

2、发家致富与“穷过渡”

在村公所的高台阶前，当着芳草地上百口男女老少的面，张金发和朱铁汉发生了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张指着大影壁上“发家致富”这四个大字，告诉村民：发家致富就是社会主义！铁汉：不！“发家致富不是我们穷人走的道！”

铁汉说的不错，穷人是大多数，发家致富的只能是少数人。三十年后，邓小平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先富得有资本，新时期的资本是权力、人脉、资源。当时农村的资本是粮食、牲口、大车、劳力和脑筋的活络。中农秦富有几千斤存粮、有胶皮轱辘大车，有几匹大牲口，两个儿子都是好劳力。但他不敢贸然行动——冯少怀买了大骡子，他想买，嘴上却说没钱。冯一针见血：“你是怕

（农民分到了土地。任冬林提供）露富呀，怕再来第二次土改呀。”

这话说到了点上——尽管《土地改革法》强调“保护中农，中立富农”。但是土改的不义和贫民的暴行还是让秦富担心：要是他真的发了，共产党脸一变，再来一次土改。那他一家人不是白忙活了吗？他的亲人会像歪嘴子一家一样，成为贱民。他本人还会被弄到台上挨斗，弄不好还会“搞把炖肉”……

就在秦富拨拉着小算盘，决定看一看再说的时候。张金发、冯少怀这些腰粗腿壮的新富已经行动起来——这是中央政策。那时节，上边号召农民“劳动发家”，村里的墙上标的是“要想发家，就种棉花”的大标语。张金发宣讲的“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上级的精神。影片中，高大泉、朱铁汉对张的抵制和痛斥，是革命浪漫主义。

张金发、冯少怀迈出了发家的第一步：“卖套”——种地需要牲口，有牲口的就把牲口租给无牲口的翻身户，换他们的劳力或粮食。第二步是与天门镇的“沈记粮店”勾结起来，囤积居奇。

¹《台湾与大陆土地改革比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408825>

上级号召，村长带头，秦富坐不住了。他用粮食换刘祥的房基地，派大儿子跑运输挣活钱，跟着村长一起，加盟天门镇的沈记粮店，倒卖粮食……。

发家致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与之配套的是单干。三十多年后，浩然承认：“其实对单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无疑单干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对那些缺乏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来说，互助组、合作社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我写《金光大道》时，我内心的矛盾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事实上，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互助组一边。”¹

单干肯定会带来新的两极分化。中央分成两派，左派为“新富农”的出现而惊呼。右派认为，这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年轻人容易被表象蛊惑——土改后一个春天的早晨，浩然在农村集市上看到一片令他深感意外的场景：摆满街道两旁出售的东西，不是农民生产的粮食、蔬菜和家禽，而是土改中分到的桌、椅、橱、柜等家具，还有从房屋上拆下来的柁檩。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极少数人变成了买地、放债、雇工的剥削者；大多数翻身农民，因为经济根底薄弱，或遇上天灾人祸，不得不（农民分到了牲畜，任冬林提供）把土地改革时分到的土地卖掉，又去当长工，在别人的土地上遭受剥削。（1980年1月，浩然在《〈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浩然的心在颤抖：长此以往，刚翻身的农民不是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



正是这种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的盲目恐惧，使浩然对芳草地村公所前的那个大影壁上的“发家致富”充满了憎恶。为了打击张金发的气焰，他让朱铁汉用暴力解决了这场来自党内高层的分歧——铁汉夺过一把铁锹，冲向那个影壁。导演为这场戏做了精心的设计——镜头从各个角度拍摄了铁汉挥舞铁锹的身姿和表情，他拥有的人心和正义，随着墙皮的脱落而彰显放大。镜头在影壁与人群中快速移动，男人的喜悦，女人的笑脸，孩子的欢乐。冯少怀在人群中的惊慌失措，张金发躲在树后面的胆战心惊。这是一幅由蒙太奇构成的宣传画。镜头最后摇到了那影壁上——“发家致富”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深一道浅一道的夹着麦桔的黄土。

¹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2008年，页239。

这是与“镐把炖肉”异曲同工的暴力美学——贫农团用镐把打死了地主富农和他们那些投身革命的儿女，左派党员用镢头铲碎了尚在襁褓中的资本主义和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庄严承诺。从此，芳草地走上了“金光大道”——用合作化阻止少数人先富起来，张金发的“卖套”计划受挫，搞假互助真单干的打算落空，统购统销的国策又断了他与奸商勾结倒卖粮食之路。从党内处分到开除党籍，影片的最后，他与漏网富农冯少怀、不法奸商沈义仁和逃亡地主、现行反革命范明一起，成了专政对象。

浩然说，他写《金光大道》时相信了四人帮的那一套，写了路线斗争。其实这是正常的。那一套在当时是主流，是革命。它关系作品的生死，以至作者的命运。就像现在人们争着拍主旋律一样，浩然岂有不趋附之理？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以历史为依托，以道德为武器，因此作品显得自然得体，生动感人。

张金发、高大泉之争，其实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之争的民间版，形象化。

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剥削有理、有功。剥削是救人。“因为没收地主的财产，把私有观念动摇了，农民不大放心。宣传劳动致富，就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¹刘少奇批评把农民的自发势力和农村的阶级分化视为洪水猛兽的党内极左派，“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²据此，1951年至1952年间，中央提出土改后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四大自由”。刘少奇讲得更为露骨：“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³薄一波解释：“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⁴

毛泽东与刘少奇正相反，要尽快完成社会主义。他嘴上说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却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此，他反对发家致富，不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他要“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⁵《矛盾论》为他提供了说服不同意见的强大武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他

¹（1951年5月13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

²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297。

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63。

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56。

⁵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297。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只是开始，不断地改变国内的主要矛盾，成了毛后半生乐此不疲的哲学游戏。于是，他为农村集体化疾呼，为总路线奔走。而在刘少奇看来，毛式的集体化不过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¹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胜利了——

高大泉发现有牲口的农户在卖套，去找张金发，要政府出来管一管。他的理由是，卖套是剥削，跟过去交地租没有区别。张告诉他，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正说着，翻身户邓九宽来找张，商量入他的套。大泉既惊且怒：“金发，我万没想到，你也卖套！”

张：“卖套又怎么着？”

大泉：“你不帮助翻身户跳过去这沟坎，反倒把他们往泥坑里面推。发家致富不剥削穷人不富。金发呀，我真替你捏着把汗呀！你全忘了，咱们入党那天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

张金发立起眼睛反驳：“高大泉，我告诉你吧，我不是翻身手的代表，我是这芳草地一百八十户的村长！你刚才说的那一套，政府压根就管不着！”

高大泉：“你把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捧起来闻一闻，还有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儿没？”

按照刘少奇的理论，不但张金发的做法满是共产党员的味，就连秦富买刘祥的地，跑运输挣外快也满是共产党员的味。然而，毛的主张占了上风——铁汉在那伤疤累累的土墙上写上了四个红彤彤的大字——“组织起来”。

这是一幅很有象征性的画面。中国的三农从此带着累累伤痕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金光大道”。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越走越窄，越走越坎坷的路。文革农村片展示了这条路由宽变窄，险象环生的变化过程——土改后，路的一侧布上了“地雷阵”，禁止通行，不准“少数人先富起来”。（《金光大道》）合作化后，路的另一侧拉上了“铁丝网”，禁止通行，“不准占集体便宜”。（《艳阳天》《山里红梅》）。公社化后，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扼守要冲，上面写着：“三自一包”此路不通（《牛角石》）。当此时也，金光大道变成了只有一线天的峡谷。而“农业学大寨”又在这峡谷中挖沟筑墙——不准搞多种经营（《欢腾的小凉河》），不准组织社员外出打工（《山花》），不准用农副产品与工厂搞协作（《海上明珠》），不准

¹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297。

社员上山采土产山货到集市上换钱（《青松岭》）。……

“组织起来”以杜绝贫富分化始，以平均主义终。以不准少数人先富起来始，以共同受穷终。金光大道就成了国人的畏途。

【评论】

“阳谋”究竟萌发于何时？

戴煌

关于“阳谋”的萌发时间，多年来有些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当年提出“整风”，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还是真心诚意的，只是1957年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才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

1999年底，建成于军博后面、八一湖南边的中华世纪坛，铸有《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历史纪事》的重达50吨的中华世纪钟，记了二十件事的大铜钟铭文，其中第十四件事，就是“反右派运动”。其后几句，虽然说“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万余人，基本上均为错案，1978年9月，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81年底，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结束。”但这段铭文的绝大部分，与前述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它说：“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5月4日，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所犯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极少数人乘机向共产党发动进攻。15日，（2011年，戴煌在农村小院。）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6月，运动基本结束……”



一、“秘密报告”：“阳谋”发芽

这样说，还是说“整风”“反右”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一点也看不出“阳谋”的味道。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实事求是地说，它应萌发于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那份“秘密报告”。

要知道，这份“秘密报告”，给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特大地震。尤其对具有帝王思想的掌权者是一个重磅炸弹在身旁猛烈爆炸式的威胁。当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就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而且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1956年9月15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就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口头禅和反对“个人崇拜”等等。而据1949年2月北平新民主出版社初版的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说，在1945年中共七大时，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一次讲话提到“毛泽东”三个字就有118次，而且在报告的最后还大喊：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才听说毛泽东曾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可是现在的情势大变特变了！对毛泽东的帝王之尊是个无比强大的现实威胁。但是出于权宜之计和看风使舵，他忍住了龙颜大怒，并在“秘密报告”引发的大地震之后，还说过这类的话：要是在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决不会发生这回事。而且当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露出要摆脱苏联经验影响的意思。

接着在28日的会议总结讲话里，根据1992年1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237页的记载，他又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说什么现在春天来了吗，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們也需要这个。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这一切，只是“大地震”后他产生“阳谋”萌芽的开始。

二、“波匈事件”：“阳谋”的“两把刀子”

1956年9月中共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紧跟着又传来了波匈事件的风云，他感到很可能在中国也会对他的帝王之尊造成实际威胁，他更沉不住气了。与9月27日才闭幕的中共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仅仅过了49天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说决不能丢弃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并且说：“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这就是说，他要拾起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横劈竖砍了，将中国式的波匈事件扼杀于摇篮状态之中。

果然，在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他都强调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那些坏人在搞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为，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了错误越大越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

这就是说，直到此时，他的“阳谋”狰狞面目已彻底暴露。不仅如此，就在彻底暴露这狰狞面目的同时，他还扩展到对越南人民忠爱的领袖胡志明的批评。首先，他在正式的报告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话：“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夸大不行，过低估计要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胡志明把土改成绩估计低了，下了罪己诏，地主没有了，引起各方面（天主教、民主党、知识分子）进攻，现在纠正了。”在别人发言时，他又插话说：“胡志明在依靠贫农的问题上有错误，不是纠‘偏’，而是‘纠正’。



对土改不肯定成绩，光讲错误，（2010年戴煌在郊外）发了一个罪己诏——告农民书。地主一变而为农民，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知识分子反党。……”

华国锋当权时出“毛选”五卷，虽然留有毛泽东在1957年1月18日和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但有人告诉我，关于这些批评指责胡志明的讲话段落和插话都删去了。这也许是掩盖毛泽东的好大喜功，成绩与缺点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的莫名其妙吧，也许是怕引起越南人民的

恼怒吧！

三、“双百”方针：“阳谋”之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之路》第四卷中的“明年岁月”第32页和《毛泽东传（1949-1976）》第620页，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1956.1—1957.12）第358页的记载，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与会者达1800多人，当时正在出席、列席第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篇报告。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时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他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肃反问题上，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今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文化，建设新国家。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266-267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第464页记载，1957年3月6日至1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160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在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这个会议的倒数第2天，即3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他同时宣布共产党内准备开始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正式出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第469页和1989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戴晴著的《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第199页披露，1957年4月30日，即“五一”节前夕，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是新时代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开战。”“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总的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要党内外一起来，帮助党整风。”他还亲切而幽默地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奉命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

这就是说，差不多已把网张得很宽大而且非常牢固了，就等“错误的意见”、“有毒素的东西”和一切中国式的波匈事件“蚂蚁”、“乌龟王八”入网了。

所以，5月15日的《事化情正在起变》，只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骗术而已。不仅如此，在“反右”高潮中的7月18日在青岛会议上，还有对胡志明这样的批评：“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这就是说，不管很多知识界人士在大鸣大放中如何强调民主和自由，如何发扬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指责一党专政、独裁专制的危害性，但毛泽东铁了心地稳坐钓鱼台，决不下罪己诏。

而且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359页，以及1981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第11版第152—154页，和2000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苏立群写的《傅雷别传》第185—186页及其页底注释《傅雷文集（文学卷）》中的“历史的镜子”披露，在1957年6月正式发表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的讲话，去掉了原稿中“不赞同再提以阶级斗争为主”等等内容，增加了“反右派斗争”之后提出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等等内容。真是卑鄙到极点，“瞒和骗”到家了！

这就使得受到破例的特邀，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先听了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录音，3月12日又现场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一度感动得五体投地，后来看到正式发表的3月12日的讲话，他才知道

大大地受了骗。

2007年10月8日

【忆往】

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

廖振旅

文革爆发之前的那三年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全国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我先后参加了三个县的农村社教，在办公室做动态收集、情况综合和总结调研工作，有机会了解所在地区运动的全貌。那时，从上到下，大家对社教运动都慎重其事，严肃认真；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戏台表演滑稽可笑之感。

—

最先是参加自己工作所在的湖南资兴县社教试点。试点选在地处县城四周的城厢公社。县委抽调 206 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挂帅，农村部长和一批科局长参加，进驻全公社 12 个大队、96 个生产队和社属各单位。地委由秘书长和一名部办领导率工作队 37 人前来参与办点。从 1964 年 1 月 28 日进队，到 6 月 5 日结束，历时四个多月。



按照中央指示，社教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央 1963 年 5 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称前十条），断言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不搞农村社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共产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整装待发参加“社教”的作者）颜色。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重点是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

分，解决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所以“社教”也叫“四清”。

运动有严格的步骤。先是集训工作队员，学习社教文件，明确运动作法。所有工作队员都必须住进农村和基层单位去，实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队部设在公社，距我所在的县委机关不到两百米。我虽不用住队，但也不得回家吃、睡，把被盖搬到公社，在公社用餐和办公。大队有工作组，组长是科局长。每个生产队都驻有工作队员，有的生产队驻有几个队员。

一个大队的具体作法分五步。第一步，宣讲中央社教文件，发动干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用土改办法扎根串连诉苦，建立贫下中农协会，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同时清查账目、仓库、财物、工分。第二步，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组织社员开会面对面批评干部(问题大的干部要挨斗争)，干部在社员会上放包袱(讲自己的问题)、作检讨，而后落实退赔计划和兑现。第三步，开展对敌斗争。评审和批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补划土改漏网的地主富农，加强专政措施。第四步，整顿组织。处理犯错的党员，发展新党员，调整党支部和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第五步，处理“公私关系”(主要教育社员爱护集体，制止诸如不积极出集体工、少交家肥、私自扩大自留地、副业收入少交或不交队等“资本主义倾向”)，健全管理制度，订立集体生产规划。

在第二步解决“四不清”问题时，也曾采取过给干部“评功摆好”的办法，促使干部“自觉革命”。就是组织干群见面会，贫下中农和社员讲每个干部的功劳、苦劳和好处(优点)，干部本人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成绩与进步。这样做了以后，据说干部就会深受感动，自觉地把自已“四不清”问题作出彻底的交待。这种滑稽的做法收效甚微，只是短暂地时兴了一阵，很快就停止了。还是坚持背后揭、账面查、当面批的办法。当时统计，全社 709 名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 494 人，占 69.7%。

有件事想起来就有点捧腹。在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和揭发“四不清”过程中，县委书记蹲点的仙桥大队举办了现场参观展览，组织全大队工作队员、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到曹家生产队看一户贫农的贫困生活。这位贫农 30 多岁，加上老婆孩子一家五口，家徒四壁，缺粮超支，穿着破烂，屋漏墙裂。工作组把这个家作典型，向全大队群众宣传干部“四不清”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用以启动大家搞“四清”的积极性。前来参观的社教队员和群

众受感动者不少，有的大骂“四不清”干部，有的给这位贫农捐赠了衣物和钱粮。当时，我却听到曹家队社员反映，这位贫农好吃懒做，出工太少。当时，社员普遍都穷，连饭也吃不饱，新国家已成立十几年了，全大队却无一户建有新房。这户贫农人口多、孩子小，又好吃懒做，自然比别家更困难了。农村穷，队干部的责任有多大？把穷的根源和主要责任推在队干部身上是冤枉。当时我不明白农村为何长期这样穷，恐怕县委书记也不知道。后来比较清楚了：那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经合一的公社体制和行政命令指挥生产的作法，还有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主要农产品长期低价统购调拨，才是穷的主因。

对敌斗争，评审四类分子是人人过关，重点挨斗，也有不少搞笑的作法。水圳头生产队有个曾任国民党师长的曹承绪，六十来岁。因为年老，天天出集体工不外出，又少言寡语不同他人交谈，在搜集“敌情”时对他竟“毫无所知”。办法很快想出来了。找到与曹同住一栋屋、又同其儿子结拜兄弟的贫农青年谢云，要他“站稳立场”揭发曹的破坏活动，否则就是“敌我不分”不准参加贫协，还要追查他曾搞过的小偷小摸。谢云果真恢复了贫农本性，揭了曹的三个盖子：有次谢的母亲病了，曹趁机送来了面条，想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有次收工回屋，曹唉声叹气，连声说“累死了”，对集体生产发泄不满、想恢复他寄生虫的天堂；还有更重要的，曹保存有穿军装的照片，是想变天。在全大队的社员斗争大会上，一批事先经过培训的积极分子上台揭发后穷追猛打，追问曹为什么要拉拢腐蚀贫下中农？为什么留恋过去的压迫剥削生活？为什么要保存反动派照片？还逼曹回答：抓过多少人当民夫、当炮灰？抢过多少老百姓？杀过多少共产党、解放军？曹结结巴巴、大汗淋漓，最后承认自己“梦想蒋介石反攻大陆，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工作组总结对敌斗争说：社员们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更加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二

继城厢公社之后，我接连两年参加由省、地组织和部署，先后在郴县、永兴开展的社教。

按照中央指示，省、地两级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以县为单位分批分期，全国用六七年时间将社教全部搞完。在省委社教总团、郴州地委社教总分团之下，资

兴以县委书记、副书记为首组成社教分团，抽调部委办、各科局、各公社一把手以及县、社干部共 657 人，于 1964 年 8 月 5 日赴郴县五里牌、街洞、太平三个公社。一年后，即 1965 年 8 月，资兴社教分团扩至 930 人进驻永兴县马田、油市、湘阴、福和、文明、和平、悦来、油麻等八个公社。郴州地委总分团和所属其他各县都组有分团开赴该两县其余公社。中南局、省委总团、郴州地委总分团和各县委分团都办有不定期的社教简报，交流情况和经验。

郴县的社教有来自最高层的新精神。中央出台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称后十条)，强调领导人要亲自蹲点，要求工作队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过硬，说这次社教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和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但要打退资、封势力的猖狂进攻，还要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推广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经验”。通过播放录音报告和中央批转报告全文，把她在刘少奇支持和指导下在一个大队的四清作法，直接传授给各级领导和每一个社教队员。

入队前，工作队集中经过半个月严格培训和整顿，除了听录音报告、论形势、学政策、议作法外，还在工作队内部开展自我批判和相互帮助。每个工作队员检查交待自己的“四不清”，而后大家分析批判，名曰“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过不了这道“关”的，不能当工作队员。我没有四不清，也得检查交待。便亮了自己想当作家、当历史学教授的“活思想”，上纲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痛加自我批判，表示一定要“不图名”、“不图利”、“全心全意”做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这是我又一次“脱胎换骨”，不分黑白地舍弃个人一切追求，心甘情愿平庸一生。集训结束前，制定和宣布了社教工作队纪律，包括社教期间不许请事假，在住户家不许吃荤菜等。



(右图：土改时期的三叔夫妇。后立者系读初中时的本文作者，前坐者系作者同村同姓同班同学)

社教在风声鹤唳中神秘兮兮地进行。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驻队都像王光美那样取了假名字。仿照桃源将所有公社、

大队、生产队干部靠边站，一切权力归工作队(组)。接着，队员们访贫问苦，阶级排队，扎根串连。组成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后，大诉“四不清”的苦，揭发干部的问题，而后批斗严重“四不清”干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郴县五里牌公社红五星大队的社教。这个大队是资兴社教分团党委书记、团长即县委书记蹲的点。他将全分团三个公社工作队队长、几十个大队工作组组长即工作队里的县委领导和公社书记、科局长们，全部集中在红五星先行试点。每个生产队有三四名队、组长，形成了强大的“将对兵”阵势，对大队、生产队干部施压逼供。有天夜晚，县委书记所驻生产队的几个干部被叫进公社和大队部单个隔离在不同房间。数名部长、科局长、公社书记对付一名干部，拍案打椅、车轮战术。不交待清楚者不许回家，由家人送吃的。果然“凑效”，几个干部交待私分生产队稻谷数万公斤，工作队大喜。进入落实阶段时才发现，私分的稻谷比该生产队年总产量还多，那几位“四不清”干部放的全是假“包袱”！

闹出这个笑话并不奇怪，它是有来由的。当时，那位被毛泽东夸赞为“农村阶级斗争专家”的省委第二书记带社教总团驻郴县华塘公社，短时间内就挖出了社队干部大量“四不清”问题，私分粮食、贪污公款数量都超过了该队实际的总产量、总收入。省委第二书记的警卫员，仅仅骂了三声“混蛋”，就搞出一位“四不清”干部几千元的经济问题。过程很简单：警卫员找这位“四不清”干部谈话，拍桌子骂声“混蛋”，那干部就交待“贪污”多少元；他又骂声“混蛋”，那干部立即将贪污加了码；他第三次骂“混蛋”之后，“贪污”款已是几千元了！传达华塘经验和省委警卫员“动人事迹”之后，县委书记无限感慨，连声嘱咐队、组长们“打掉右倾思想”，“彻底清查‘四不清’”。当然，我们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毕竟不是糊涂人，那些被逼供出来的“包袱”后来都被“落实”掉了。只是那令人惊恐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相信许多当事人会一辈子铭刻在心。

更有甚者，县委副书记(也是分团副团长)任工作队长的街洞公社，下属牛形坳大队的工作队员作风更是粗暴，竟逼死了一名基层干部。经过上级调查核实，发出了正式文件通报批评，刊中央中南局内刊《中南社教简报》上。

三

1965年1月，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称

“二十三条”)，把社教原来的“四清”具体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确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把它定为运动要整的重点。将基层干部分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前两种是多数。对“党内走资派”这个新概念，分团和各工作组领导都想不通，接受不了，私下议论纷纷。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领袖毛泽东已把注意力放到了整党内当权的走资派身上，基层干部虽然需要整，但已不是重点。

这样，在永兴八个公社的社教中，步骤和作法虽大同小异于郴县，但对基层干部的逼供显著少了。突出的是加大了普及毛泽东著作的力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动。各队都办起了学习室，几乎人人有《毛泽东选集》和语录本。用学习所谓“老三篇”，向基层干部和社员大力提倡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工作队中有能人，培养了不少典型，帮助一批文盲、瞎子、老人强记硬背。把他们的某些行为如多出集体工、爱护集体财产、帮助别人、克服困难、揭发坏人坏事等，都同“老三篇”中的某句话、某个观点套挂在一起，以体现“活学活用”。而后在学习“讲用”会上现身说法，借以显示出毛主席著作的威力“巨大”和“神奇”。队干部放“四不清”包袱、交待问题和批判自己的错误，都要诱导他们同毛语录挂上勾。这种用“读、背、挂、讲”形式主义的学习运动主要来自上面的部署和报刊、电台的宣传，陷入了庸俗化，也为全国的造神运动和文革作了精神铺垫。

永兴社教期间工作队学毛著，更加提倡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实行“三同”。分团不设在公社和集镇中心，却设在偏远分散的小村中。办公室五、六个人在大队一栋老旧公房中住宿、办公，分散到附近农民家吃饭。我每月有几次去八个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收集情况，无论几公里或二、三十公里，有公路班车相通，都极少坐车，主要是步行。我把这看作是“革命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走路上，更不怕两腿酸痛口干舌燥。由于规定不许吃住户家的荤菜，不许进馆子或加餐，弄得社教队员挨饿。有次我去文明公社一个穷队住了三天，每天是一稀两干。所谓“干”，并不是大米，而是红薯，菜是没放油的南瓜。饿得我难受，也只好忍而不露。后来，省委社教总团统一规定，给每个社教队员每月发两市斤饼干，饿了喝着水吃几片，总算解决了一点食不果腹问题。

在永兴我痛感“大跃进”和“五风”带来的巨大损害和后遗症。有一次在悦来公社了解到，“大跃进”兴修悦来水库期间，社员们忍受不了劳苦、饥饿和干部打骂，有20余人在水库周边的山林里上吊自杀身亡。在发动社员群众忆苦思甜时，我亲耳听到中老年农民往往大诉“大跃进”和“五风”之苦。其它公社、大队也有类似情况，使得分团和工作组的领导颇感为难，曾为扭转这种局面作过认真研究和部署。

1966年8月，资兴分团工作队员集训打算开赴耒阳县时，文革开始进入高潮，党政瘫痪，社教按中央指示纳入文革而销声匿迹。

四

说到社教错整人，还不得不同中央两个“十条”强调的民主革命补课和清查、补划土改漏网的地主、富农联系在一起。郴、永两县社教中都有这种补划，可惜我曾了解到的这类资料已不在手中。但记得发生在老家的一桩惨事，简记在此。

我的家乡郴县良田公社是省、地两级于1963年8-11月开展的农村社教试点。工作队员除省、地干部外，出于扩大社教运动的需要，也从郴州地区所属各县抽集，共389人。三个月试点结束，1147名大队、生产队干部，“四不清”的占78%。运动中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分子。我的三叔廖开钰，时任良田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经济上没有问题，但在“组织上”却出了特大问题。他被补划为富农分子，撤职、开除党籍，由组织不清带来“思想”、“政治”不清，沦落成为专政对象。



三叔曾是土改工作队干部，穿过灰色服装、戴过八角帽。土改结束时，他产生了当时全省流行过的“李四喜思想”，认为革命成功了，想往“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家中老婆年轻貌美，自己人高马大劳力强，便不愿当干部吃“供给”，辞了职回老家务农，“大跃进”时当了公

（设在偏远农村的不挂牌的社教分团办公室）社企业厂长。划他富农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养过一名婢女。那婢女12岁，从衡阳农村逃难到良田，被有几

无女的三叔父母收养认作“闺女”，直到1954年20岁嫁出。这本是慈善之举。可是，按阶级斗争理论和土改划阶级标准，三叔土改前三年虽无房屋田土出租，无钱放贷，也不曾雇长工月工，但把“剥削八年婢女”的账算上，就够上了富农！

从此，三叔全家陷入没落。做民办教师的大儿子被赶回了家，找不到对象成亲，单身至今；曾以家旺人旺自豪自强的妻子，在划富农后三年气病交加身亡；本人也无法抬头做人，同村不少人幸灾乐祸，甚至训他、骂他，同情的人也不敢去接近他。只有受他“剥削八年”的那位出嫁的婢女常来探望，逢年过节必给他送米送菜，多少年从未间断过。

1979年，三叔终于盼得平反，被告知富农划错了，恢复了党籍。可惜此时他已年过花甲，疾病缠身多年，再也不能重新站起来弥补损失，平反的次年便撒手人寰。这位在花岭生产队里劳动力最强、最为勤奋的汉子，1949年后第一个盖起了新的二层楼房，撑起了全队人羡慕的小家庭。社教把他打翻在地，粉碎了他发家旺队的美梦，强迫他过了16年受压、受气、受穷、受苦的日子！

社教是中央“左”倾理论思想系统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文革预演和前哨战。

2012. 5. 20

【序跋】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前言

啟之

第一辑 前言

今年是“林彪事件”四十周年——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把手，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因不堪毛的淫威，乘机出走，不幸飞机失事，与妻、子葬身于蒙古的荒野——温都尔汗东北八十公里的贝尔赫。

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它的震源在中共政治，震中在中南海，震波则到达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它摧毁了千万个家庭，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蒋介石闻讯而喜，告诉蒋经国：毛失去了一个臂膀。毛泽东为之而衰，尽管他嘴上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忙。”可直到躺进水晶棺，这场地震的“次生灾害”他也未能挽救于万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失去了“道”，失去了人心。

此书就是这场大地震的产物——它的作者都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这些作者在当时，年长者，已近中年；年幼者，尚未入泮。其位尊者，为红朝将军之后裔；其位卑者，乃革命专政之对象。这里的作者谈不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也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从军人到工人，从干部到知青，从小学生到政治犯。

甲申三月十九日（西历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杀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赵园在《那一个历史瞬间》中说：“这个日期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更甚于其作为事件的重要性。”（《想象与叙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页7）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九一三”。

我并不是说，林彪之死与崇祯之亡有多少可比性，这句话触动我，是因为作为地震的亲历者，我深知“九一三”这个日子对社会心理的震撼，同样远远大于它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这本集子证明了我的感受——这里的作者们在闻知林彪事

件之后，都程度不同地对毛，对文革产生了怀疑。林彪之死，像投入人心的一颗巨石，它在瞬间激起的波涛，经岁月的消磨化做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涟漪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孔的喧嚣之中，悄悄地浸渍着人心。怀疑是否定的胚胎，否定是反抗的前奏。这涟漪在人心中酝酿着，等待着，酝酿着反抗，等待着时机，在“九一三”发生五年后的那个四月五日，这人心中的涟漪在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人群的洪流。

在“两案”开审前，胡耀邦问邓小平，林彪怎么审？邓反问胡，你是要毛还是要林？胡无语。从此，革命功臣的林彪和他的战友们从此成了反革命，与军委办事组所厌恶的江青集团一起，当了毛泽东的替罪羊。于是，那个著名的《决议》给文革下了这样的定义：“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利用论”赋予了“九一三”新的心理意义——“林彪事件”从大地震变成了活火山，每逢适当的时候，这火山都要在人心爆发。

此书就是这火山爆发的结果。这里的作者，当年没上小学的，如今也人到中年。从文革到改革，从毛时代到后邓时代的人生经验，使他们有资格发问：究竟谁利用了谁？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利用了林、江？《决议》为文革下的定义，是政治的，还是历史的？是科学的，还是糊弄人的？进言之，如果一个社会的稳定，需要靠掩盖、歪曲历史真相来维持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它能否稳定？

康熙、乾隆不会想到，在大兴文字狱，芟删天下图书之后，满洲八旗在十七世纪中叶的罪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会在十八世纪后期传布人口，为大清帝国的倒台添砖加瓦。

久加诺夫不会料到，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歪曲、掩盖了二三十年后，仍会成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动力。

毛泽东想到了死后的“腥风血雨”，但没料到，邓小平用他的夫人来为他顶罪。邓小平“舍车马保将帅”，却没料到，“利用论”既没有保住毛，更没有保住“道”，还把他自己搭了进去——“九一三”事件在他手里从地震变成了活火山……

历史的魅力，或许就在这些意料之外之中。

此书采取“一日型”的纪实文学的形式，由《记忆》在2011年4月发起，以电子信的方式在朋友、熟人的小圈子内征文，意在通过回首当年，评说林彪其人及有关历史，以对抗有意的抹煞和无意的失忆。因无法借助大众媒体，所以，知者甚寡，半年来，得稿仅49篇，34万字。编者从中选取了28篇，15万字。

“一日型”的征文活动和图书出版，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中国第一部由“一日型”征文编成的图书，是1936年由邹韬奋发起、蔡元培作序，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1936年4月，茅盾以上海文学社的名义，在《大公报》上向全国征文，号召作家、非作家及社会各阶层人士，以1936年5月21日为主题，记述这一天之内周围所发生之事。以“发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现实面目，彰显这一天之内的中国全貌。”来稿3000多篇，600多万字。经三轮精选，以490篇，80万字成书。成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此后，这种“一日型”的征文和图书出版不绝如缕：1938年有《上海一日》，1941年有《冀中一日》，1949年有《渡江一日》，1953年有《志愿军一日》。2009年有北方文学发起的《21世纪中国的一日》。

上述“一日型”的征文活动都是公开的，都是借助大众媒体进行宣传，都得到了主流文化的支持和赞许。而这次由《记忆》发起的征文是地下的，它所谈论的一日是官方的禁区。上述图书都在国内出版，公开销售；而此书的出版却只能远避海外。上述征文之发起、编辑，皆由名家牵头，而此书却只能由寂寂无名之《记忆》领军。这诸多的不同，说明了什么？

第二辑 前言

2011年8月24日，文衡文化公司与《记忆》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了论文的 authors 们从美国、香港、南京，自掏腰包而来。此书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

发生在“九一三”的林彪事件是国史上的大事，四十周年之际，官媒无语，学府噤声。“礼失而求诸野”，这个会议彰显了大陆民间的学术勇气。

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年头难找荒江，文革学者也谈不上野老，如今的“朝市之显学”比如法律、经济、企管、民国史算不算是俗学，我吃不准。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文革的都是远离功名利禄的素心人。

我所说的素心不是没有出书扬名的心思，不是没有获奖成家的欲望。他们只是不想礼拜庙堂，不愿从主旋律中分一杯羹，不屑于为教授、博导、院士头衔折腰而已。当然，同是不想、不愿、不屑于，各人表现的强度、长度也各有不同，据我估计，这里面最顽冥不化的，是那种宁愿老死在冷板凳上，也不愿到“百家讲坛”上露脸；宁愿像《如焉》中的达摩那样在网上发飙，也不屑于给中南海的大员们讲课的主儿。

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们吃不上葡萄！

不，他们想吃的不是这种葡萄！

人们喜欢说，什么什么研究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照葫芦画瓢，我得说，本书的研究不但填补了学术的空白，而且填补了学风的空白。章开沅有言：“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压力与金钱诱惑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君主专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学的忌讳乃至作伪，而商品大潮的冲击则会诱发学风的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陈才俊：《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当今中国的学风如何，学界多有领教，无须我在这里细数。把学风视为社会良心的最后寄托的章先生，相信会从这次研究者的身上，感到前所未有的欣慰——此间的学者不但早就把政治的压力当作了求真的动力，而且他们用自己的成果昭示世人：在抄袭剽窃横行，拜金主义泛滥，沽名钓誉成了美德的学坛上，这里还有一方净土。

台湾历史学家杜维运有言：“易代之际，历史真相最易流失。”（《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从毛到邓，虽仍为一党，但事如易代。既是“易代”，真相岂有不流失之理？宋史要“流失”赵某夺柴氏天下之事，满清要“流失”向明朝纳贡称臣之史，邓及后邓时代自然也有自己要“流失”的东西。为了克服这“流失”，除了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外，还要提高我们的“思考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搞学术的基础，是区分学人品级，学术高下的标准。古人把这种能力，称为“识”。即见识、史识、志识。梁启超说：“史识是讲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有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页20）章学诚将志识与文辞相比较，以凸显其作用：“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

炉锤也。”（《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问世，二十多年来，各类的文革史一出再出，而此书的地位岿然不动。原因何在？它不仅有材料，更有识见。章学诚批评清中叶的史学界：“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章学诚遗书》页82，文物出版社，1985）这话也适用于文革研究。多年来，文革研究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汲汲于搜罗资料，而忽略了对资料的“极深而研几”。有些著述者乐于炫耀自己的注释之伙，文献之多，而惰于锤炼自己的识见。

赵园说：“征引的烦琐，即缘不能精当，材料本身的说服力不足。征引应当是一种发现，对引文的发现，这样的征引才不至于成为单纯的炫博。”（《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页269）因此，她发出这样的感慨：“取精用宏，是太高的境界，却不妨心向往之。”取法其上，仅得其中。若以此境界为圭臬，文革研究会有大长进。

2011年10月30日

编后记

在征文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被主流打压的文字不能在大陆付梓。作者们跟我一样，对出书也没有抱任何希望。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稍懈，邵燕祥、曾林辉、程光、胡小水等人多次修改，精益求精。黄春光、邱路光中断旅行，急返京城，为《对话“九一三”》字斟句酌。最令人感动的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作者，“两头真”老人戴煌先生，不但慷慨赐稿，而且动员了他的夫人潘雪媛女士和女公子戴为伟，为此书拨冗挥毫，增光添彩。

人们说，影视是遗憾的艺术。其实编书也一样。编这本书的最大遗憾就是，因为字数的限制，不能将这次研讨会文章尽收集中。如，司马清扬的《建国后周恩来和林彪关系之探讨——兼论建国后几个重大党史事件中周恩来和林彪的表现同与异》（16万字），蒋健的《回望“九一三”——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10万字），余汝信的《李作鹏回忆录中的“九一三”》（1.4万字），徐海亮的《黄吴李邱回忆录中的武汉事件》（7千字）。丁凯文的《文革期间的军委办事组》一文，原为4.6万字，因为篇幅关系，也只收入他的缩写版。而为了给年轻的学者

留出篇幅,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老先生嘱咐我,可以把他的论文撤掉。这又丰富了遗憾的况味。

其实,这些遗憾是建立在一个幸运之上的——为此书的出版,我跟几家海外出版社联系,其中还包括《记忆》鼎力相助的一家,但都遭到了冷遇。台湾秀威的主编蔡登山先生慧眼独具,看出了此书的意义与价值,秀威的责编,千惠女士的敬业更为此书锦上添花。戴为伟女士,不憚辛劳,义务为此书校对,为我节省了时间。生于八零后的微尘女士无价为此书设计封面,虽未被出版方采用,但其之深明大义亦可佩可感。林彪将军之婿张清林先生、吴法宪将军之子吴新潮先生提供的温都尔汗的照片,使本书的装帧在脱俗出新之中,透露出深重的沧桑感。

前时,参加一个座谈会,席间有人说新民主主义多么美好,多么适用。未来的新班子多么多么有必要实施之。我问:这个主义允许在国内出版回忆“九一三”的书吗?此言一出,举座无语。

秀威之意义,于斯可见。

【访谈】

荒诞人生——方昕口述（二）

文 静

九

文化大革命真正作为一个运动，前面实际上都是铺垫，虽然不断有批判，但那个时候的党组织、政府还在，所以都在控制之内。刘少奇以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身份，一直希望把运动引向政府所允许的、所倡导的、所规范的道路，但是聂元梓他们那篇大字报[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出来，一下就给冲破了。虽然他们针对的是北大，但因为它的旗帜非常鲜明，火药味儿非常浓，全国一下就给“轰”起来了。

1966年6月1日晚上，广播电台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各个系都有学生听到。而且我记得，当时已经很晚了，听见就听见，没听见的就睡觉了。金毓镇有个收音机，我们听到了，主要就是说：“北大领导秉承了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压制学生的积极性，企图破坏群众运动，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运动被引向了何方？”我和金毓镇属于一来比较敏感，二来平时离组织比较远一点儿——假如是离组织近的人，碰到这种事，直接就去找书记了。那天晚上，音乐学院所谓的左派、右派、中派都没睡觉，我和金毓镇也一起商量。当时我们就觉得，既然北大秉承了北京市委的黑指示，那么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也一样，因为精神是一样的，也说了同样的话，同样压制了群众运动，要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我说我要写份大字报，他还有点儿犹豫。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风声说是要搞运动，他爸爸就提醒他，说：“千万不要蠢蠢欲动，不要忘记57年的教训……”所以当时也非常紧张，毕竟有风险，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

得，既然聂元梓敢写，既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敢播，……最后决定，还是要写。

“音乐学院何其相似”，就是说，和北大的情况一样，也是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压制群众的积极性，条条框框限制了群众对于音乐学院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等等等等的揭发和批判，其实这也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我当时那个兴奋啊，累、抽烟，等写完了，整个人都“背”过去了。小时候，我从防火梯上掉下来过，留下脑震荡的毛病，经常一激动就休克。结果把金毓镇急的，赶紧给我掐人中、拿凉水泼，这才醒过来。

第二天早上贴出来，各个系都有那么一份，也不多，就在一楼、二楼之间最显眼的那面墙上，不论上学的、下学的、吃饭的、玩儿去的，都路过那儿看。当时感觉非常的恐怖，一下子凝固了，写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这篇东西是什么。据说，学校保卫处的人还去拍了照，要留下证据，等着秋后算账。我们那篇是我和金毓镇俩人签的字，也有三五个、五六个人签的，有的人后来又反悔了，上去把自己的名划了，总之什么情况都有。你看吧，大字报一出来，平常的积极分子等等一下就被推到了党组织那边，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自然的力量。平常不大靠拢组织的，这些属于中间派，马上就面临着你往哪儿站的问题。而后来音乐学院打派仗的几个头头儿，主要就是第一批贴大字报的这几个人。

其实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来讲，应该高层的事情高层解决、中层的事情中层解决，用不着直接交给老百姓来办，或者一层层往下传达，最后才到老百姓。但那次的广播是向最基层群众直接发布的，中间过程全省了，连市长、省长都不知道这个精神，所以像赵汾[赵汾（1916-2001）：祖籍河南项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这些人一下就手忙脚乱了。你想，北大的党委书记，那官儿大多了，结果一张反对他们的大字报全国广播，中央没有一个人表态说陆平、彭佩云是对的，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也没人说话。连北大校长都被批了，那赵汾等等就更不用说了，等于把他们晾那儿了，所以马上向教委、北京市委反映，怎么办？问题又直接提到了刘少奇头上。后来就从部队抽调一批高级干部，不是连长、排长、营长、团长，那都是师一级以上的干部，组织工作组到各个大专院校来指导工作。

过了大概也就十来天，高军院（“高等军事院校”简称）的人来了，都是牛哄哄的。对于那些左派们，那就是大救星驾到。因为如果赵汾倒台，手底下的这些人就等于没爹没妈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恐怖。工作组一来，这些人是敲锣

打鼓的欢迎，哇——，可盼着主心骨了，那个高兴呐~~~。我们这些人立刻就感到：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要挨整了。

很快，工作组宣布，这些写了大字报的都是“反动学生”。各个系、各班都有人被揪出来，管弦系还有一个张云璋。他是“管五”（管弦系五年级）的，可能也是第一天写了大字报，或者是第二天写的，或者是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太不记得，反正也有他。

解放军来了，那叫什么呢……首先是在政治上把你孤立起来，没人敢跟你说话了，同学一下子就见了你赶紧躲。虽然没有隔离，也没有限制你，只是宣布“这是反动学生”，要开他的会，先组织一批人写大字报。我们班那个黄云生，好家伙，那真是万言书，说我们是“假左派，真右派”、“假革命，真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双料流氓”……反正又不负法律责任，那就怎么邪乎怎么写、怎么难听怎么写呗。最后用毛笔抄成大字报，那么老长，字儿也练出来了，大概一天一夜都没写完。现在想起来，当然我也不恨他，因为毕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说你也没用，不说你也没用。而且，那家伙平时就喜欢吹牛，过去一块儿玩，我说我从二层楼的防火梯上掉下来过，他说：“这算什么，我从五层楼高的树上掉下来，大头朝下，没事儿。”我说我爸爸自行车骑得好，会“定车”，他说他爸爸能在铁轨上骑自行车——也不知真的假的，反正吹牛不上税。就那么一个人，你说，我怎么会恨他？

后来让我们写检查，也没人理，成天就在自己的小琴房呆着，把你受资产阶级影响、个人野心爆发、无组织无纪律等等，都从根子上挖掘出来。前后大概有三个星期，那张云璋，简直就瘦的跟鬼一样。还有黄远浦，大概是发表了一些同情右派的言论，也属于没站稳立场，反正给划到这边来了，都要做检讨。黄远浦是音乐学院子弟，属于除了拉琴、什么都不行的那种人，文化课一塌糊涂，字儿写的简直比上幼儿园的都娄。有一次我路过他那琴房，见他在那儿特痛苦，就凑过去问：“怎么样，写的怎么样？”他撇撇嘴，一脸的委屈，说：“啧啧，我写什么呢……”看看没人，我小声说：“过半个小时，你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写一份儿。”后来我真给他写了，什么“我爸爸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

我们这边写检查，他们那边开大会，等于把咣了咣当、快散架的这屋子又给

支起来，也象征性的开几次批判大会。那时候，赵汾、马思聪等等都被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不谈具体的，就是去学党的政策。时不常也把他们叫回来，非常温和的，对音乐学院修正主义路线、崇拜“大洋古”等等进行一些批判。赵汾有过一个著名的言论，说：“贝多芬是珠穆朗玛，是全世界公认的乐圣，我们起码是希夏邦马，那也可以嘛。”珠穆朗玛是 8848【致编辑：8848 已经成为一个代码，不必加“米”】，希夏邦马比它矮一点儿。再比如，那时候提倡学民乐，我们都不爱学，赵汾说：“你们四根弦的都拉好了，两根弦有什么难的？”后来把这些话又翻出来，说他贬低民乐，但也只是不痛不痒的批判。可见，刘少奇当时还是想把文化革命局限在所谓“文化”的范畴之内，和风细雨的来做思想工作，哪知道毛主席是想搞一场真正的革命，从组织上把你们给消灭了。

当时工作组在底下已经散出风来，说我们都属于阶级敌人，将来是要严肃处理。记得中间我还回过一次家，就跟我父亲说了，说自己被打成“反动学生”，这是又一次“反右”。

他说：“不，这次跟 1957 年不一样。你们写大字报，这是毛主席号召的，你们没有错。……至于你自己，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领导让你检讨，也好，正



好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我爸爸是个老革命，从延安开始就没断过挨整，所以他说：挨整不可怕，但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1966 年夏，中央音乐学院“八·二二”事件斗争大会。金毓镇摄）没做过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这是原则。反正我爸爸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放心了，回来以后，我又跟金毓镇说。但是他也回去跟他爸爸说了，结果他爸爸说：“这次跟 57 年一样。”所以后来他就悠着点起码不出头、不露面。不像我，后来我是点儿天不怕、地不怕了，呵呵。

1966年7月29日，毛宣布撤销工作组，全部撤销，当天晚上就走。而且这次也是直接向群众发布，并没有一层层往下传达、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所以也是非常戏剧性的。

在这之前，我们都被隔离了，学校秩序也恢复了，被右派学生领错了路的运动又被拉回到正轨上来。虽然也让我们写检查，把我们的“反动气焰”给压下去，但没有说戴高帽子游街之类，什么处理都没有。当时我们就觉得，运动已经完了，将来或者劳动改造，或者发配边疆，那也无所谓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很孤独，也很渺茫。突然的，一天早上有个人通知我，说下午三点半到学校门口集合，坐车去开会。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当回事，反正到点就去了。是个吉普车，最老式的、帆布棚子的那种，我一看，后边两排长条凳，都什么人去呢？工作组的成员带着左派的学生领袖，除此以外，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我一人。他们当然特高兴，说是去人大会堂，我就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也没人理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要求各单位左、中、右都有代表去，所以右派一扒拉，大概我还相对可靠点儿，就叫我去。

去了以后进人大会堂，还是在那个“万人大礼堂”，上、下三层，里面都是大皮椅子。那天来的人很多，全部都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上面两层我没注意，但一层都是坐满了的，我们在第五六排，那就离主席台很近了。坐好以后，主席台就上人了，哇——，除了毛主席没有，什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江青、康生、陈伯达，所有的头头脑脑全来了。我要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周恩来主持的会，宣布大会开始，然后是刘少奇、邓小平等等挨个发言。

刘少奇最先讲话，他有一句最著名的言论，说：“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当年革命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大，没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吃饱了饭没事干，干什么？干革命嘛……”就这么说说说，一直到最后，这回我听明白了：敢情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哎哟，我的那个心呐~~，嘻嘻嘻嘻。回头再看那些左派，一个个灰头土脸——刚高兴了一个多月，结果他们错了，哈哈……

其实从刘少奇内心讲，他并不认为这些学生是干革命的事，不过就是捣蛋。后来再揣摩他的话，大概是他想领导这个革命，但是错了，那就不领导了，言外之意：“那你们就干嘛！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刘少奇之后，其他那些人的发言我都不记得了，既然派工作组都错了，剩下什么都甭说了。整个儿会的时间不长，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每人说几句，然后就散了。大家正站起来要走，忽然看见毛主席从台侧口出来，大概事先谁也不知道，也没任何人宣布，突然他就那么出来了，站在台角，冲着下面挥了挥手。哎呀——，大家那个高兴，站在大皮沙发上，跳着脚的喊啊，不管你是左派、中派、右派，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就在头两三天，广播和报纸上还宣传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红小兵”，忽然毛主席一下在这儿出现，那就是“司令”来了，大家能不高兴么。

等回到音乐学院，那就不一样了，我是已经一身轻松。学校里正开批斗赵沅的大会，那些工作组的人还在上面神气活现的，正领导运动呢。自从被打成“反动学生”，像这样的会是不允许我参加的，所以我一进去，所有的人都回头看，说：“哎哟，他怎么来了？”我就跟他们说：

“告诉你们，工作组错啦，今天晚上就走！”

“真的？”

“真的！我刚从人大会堂回来，见着毛主席了！”

我是见人就说，一个、一个挨个儿说。于是乎，我们这些右派学生又翻天了，找大喇叭在学校里喊：“滚蛋！滚蛋！！”然后，大标语也出来了，大字报也出来了，工作组就蔫不出溜地撤了。

一下，就泾渭分明了，左派的归左派，右派的归右派，中间派的归中间派。你可以选择造反派（右派），也可以选择保皇派（左派），或者中间派，基本上都是这样，人人都是其中的一员。工作组走了以后，保皇派就有了一段时间的真空，个别人“投敌叛变”，跑到另外一边去了，但剩下那帮人也要选择他们的路。比如里面有很多高干子弟，家里是当官的，别看他们原来反对造反，一旦工作组撤了，一下他们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而且政治就是这样，谁的调门儿最高，谁就成了走在前面的人。他们打赵沅、打马思聪，把那些老师拉到广场上，在太阳底下晒着，一个个叫起来斗，开始是拿墨往脸上写，后来把半桶墨水都直接倒身上，拿皮带抽。

其实6月2日以后，有一个多月工作组的压制，学校里还基本稳定。但是到了7月29日晚上，一下决了口，而且各个单位都乱了，运动一下子走向了社会。1966年8月所谓的“红色恐怖”，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抄家。抄家这件事情，

从人类历史讲上，只有纳粹这么大规模地干过，抄犹太人的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受共产党领导，但是“红色风暴”一起，那是想抄谁家，抄谁家；谁抄家、抄谁家都可以，否则就是阻碍革命。比如你出身不好，在学校里被人说成“狗崽子”，但是到了街上，你也可以戴个红袖箍抄家，反正没人问。

像音乐学院，开始是抄赵汾、抄马思聪，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或者知道某某同学家是国民党，这都算有个说法，是有目标的，后来就发展到在胡同里乱串。比如二三十个红卫兵，打着旗子、唱着歌，走到胡同口，老头儿、老太太说：“三号那家是国民党。”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都是进去就抄。红木家具之类大件的的东西往卡车上一扔，堆在天坛东边那个老的体育馆。小件的，谁揣兜儿里就是谁的。我那琴房里还扔过翡翠手表之类，不知道是谁搁那儿的，最后怎么没的我也不知道。音乐学院抄老师家，东西堆在礼堂后面的化妆间，后来有人从窗户跳进去，就各取所需了。比如赵汾有一个德国相机，双镜头反光的，当时都要两三千块钱，后来被人拿四川去了。还有唱片，马思聪的貂皮大衣等等，文革以后全没了，空了，被人拿光了。

那时候抄家，家里有不服气的，然后就打，死了也没有说登记之类。我弟弟那时候上初一，在十九中，抓来的那些人就都让他看着。你想，那些中学生也没什么教养，也没什么规矩，就是一种虐待狂。白天在外面折腾完了，晚上把这些人拎出来，逼着他们喊“国民党万岁”，不喊就打，喊了打得更狠，有的真就生生给打死。到清晨时候，收尸的卡车来了，说：“有人没有？”直接就拉走了，问都不问的。

音乐学院有个女学生，学钢琴的，她爸爸是大学教授。过去北京的胡同三教九流都有，有做生意的、教书的，也有拉洋车、摇煤球、卖烟卷的，什么人都有。在国民党时期，大学教授的待遇很高，而且他们家几个子女都有出息，都是工程师、大夫、律师之类，在这条街上等于羊群里出骆驼。加上他们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膀大腰圆，进门、出门有点儿趾高气扬的，可能也比较遭人恨。结果到文革的时候，有一次三十多个中学生到了这条街上，老太太说：“他们家是国民党。”红卫兵就冲进去了。那天，他们家只有老头儿、老太太和小孙女，还有她的一个表哥在，开始是他们家人挡在门口，说：“我们家一没打过仗，二没从过政，怎么会是国民党？……”就是不让进。但架不住对方人多，你这边拦住五个，

那边已经翻墙进去了。翻箱倒柜在那儿闹，一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最后从衣箱底儿翻出一张照片，是她爷爷当年的学位照，戴着博士帽，背景是蒋介石的头像。你想，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翻出来，他们家不服，红卫兵也一肚子气。这张照片一翻出来，这就是铁证，活活把这几个人全都打死了。

十一

1966年8月，音乐学院的极左派们独霸学校，成立了“八一八”，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他们就以此命名。很快，那种三五个人、七八个人的小组织就都出来了，像“红教工”、“风雷动”、“长缨”等等，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后来，“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把这些七零八碎的小组织都整合了，变成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最后是以刘诗昆和王义新、高贵毅等等歌剧系为主的一帮人。开始我们也在“战斗团”，分出来后，改称“东方红公社”（简称“东方红”），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呢，那就先团起来。

其实大家聚在一起，有很多是个人上的原因，比如我跟你熟、跟你好，大家“抱团取暖”。“八一八”那一派的人基本都是高干子弟，如果你出身不好，或者家里官儿不是太大，去了人家也未必理你。而且那时候，谁也说不准形势到底往哪儿去，私底下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比如说“八一八”，严晓藕的爸爸严佑民是公安部副部长，还有陈莲什么的，那是给毛主席都写过信的人，跟着他们就错不了。你也可以跟方昕，因为他妈妈是老红军，或者跟刘诗昆，他的后台是叶剑英。说实话，其实大家都是看着中央的脸色行事。

后来“东方红”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1966年底就又分开了，理论系的那拨人叫“北京公社”，我们管弦系的这帮哥们儿改称“红岩兵团”（简称“红岩”）。我们这派可以算是中间派，很多老师和一些出身不大好的学生都倾向于我们，后来就人越来越多，弱势群体都跑我们这边来了。“北京公社”的人是搞理论出身的，所以就更学究一些，有点儿自视甚高、孤芳自赏的那种，很少跟大家联系。而且，由于他们在一些大事上不是那么旗帜鲜明，不像我们，比如夺权，刘诗昆他们去夺权，我们就是要反对，所谓“打派仗”，那就得打嘛。但“北京公社”属于比较蔫儿的，研究来、研究去，就开始怀疑戚本禹、怀疑中央文革，甚至于到了最后，他们开始怀疑江青，所以他们人很少。

1967年“一·一九”文化部夺权，那是刘诗昆他们带着人去的，把文化部所有的章子都收来，大楼都给占领了。很快，在中央文化部系统的各个单位形成了两大派，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糟得很”。夺权是当时的时髦，1967年“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是支持的，所以当时各个部、各个省市都有被夺权，都存在“好得很派”和“糟得很派”。我们“红岩”属于后者，因为当时我也有个简单的判断，不可能说谁把章子抢了，谁就当部长了，这是不可能的，到时候中央总得管。所以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到文化部去集会、贴标语，到天安门去游行，提出口号要他们“滚出文化部”，就这么天天闹、闹、闹。当时各个部都被夺权了，比如地质部，那是地质学院“东方红”干的。办公大楼被占领了，外地来大串联的红卫兵也进去了，还有夫妻俩在那儿开房的，冬天暖气烧得倍儿热，没人管，也没床，就那么在地上睡。后来闹得实在不成样子，中央终于说话了，各部夺权一律撤出，没有一个承认的。

那是1967年的二、三月份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已经听到风声，说中央要让夺权派撤出，于是“战斗团”就到歌剧院的排练厅开会。那次不知怎么搞的，让我们这边知道了，拿着大喇叭把人都叫上，又把芭团、中央乐团、舞剧团的那些“糟得很派”联合起来，一块儿冲到歌剧院。他们在里面开会，我们在



外面喊口号，最后就往里冲，他们从里面拿个大铁杠子拦着门。因为我是带头的，里边的人往外挤、外边的人往里挤，正把我夹当间。加上我个儿也小，一会儿就喘不上气了，好家伙，

那真是能死人呢。

我们附中那个班有个吹小号的，中学毕业以后分到歌剧院，因为她出身不好，文（1967年1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内游行，举大旗者为方昕）革中属于“逍遥派”。那天她也去看热闹，最后被挤到排练厅的走廊里，我也是被挤到最墙角了。你想，

我们都四年没见过面，结果在这儿给挤一块儿，你说这有多可笑。而且，当年我在班里是个小嘎巴豆，岁数最小、个儿也矮，没出过头，没露过面，平时特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儿，一点儿苗头都没有。所以她觉得特不可思议：这人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在那儿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讲？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从头到脚就是一个“夺权”斗争。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把刘少奇手里的权夺回来。周恩来“行左实右”、“阳奉阴违”，表面上帮着毛主席，其实是把毛主席想拿的那个权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抠”。所以，虽然毛主席想把权交给江青这些人，但因为周恩来在那儿主持着，而且老的权力集团那些人也不会轻易把权放掉，所以拖了很长时间也解决不了。表现在社会上的就是打派仗，这个派闹、那个派闹，实际往上追根溯源，各派都能追到中央的这个利益集团里面。

那一次，刘诗昆他们“一·一九”的夺权没有实现，“红岩”算是打了个胜仗。从中央来讲，虽然各省的夺权已经被否定了，不能再这么散下去，派仗也不能这么打下去，但是这个“车”已经刹不住了，怎么办？按照周恩来的想法，由部队出面，叫做“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派部队系统的人到各省、各市、各个单位，由部队来捏合，重新组织领导班子。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机关叫做“中央文革”，那是直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其中陈伯达是组长，康生是顾问，江青是第一副组长，下面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这些人。“中央文革”下面成立了一个文艺组，管文化部，是受江青钦点的。

在筹建文艺组的过程中，戚本禹曾经到艺术界的各个单位来，比如1967年2月去了中央乐团。我印象很深，大冬天的，顶着风，从音乐学院的石驸马大街骑自行车到和平里。我们就算去旁听吧，虽然你也是一派的头头儿，但你得知道点儿中央的精神、知道点儿小道消息，才能决定你干什么。所以说，我们这些造反派不过就是江青的一个马前卒，不是说你判断什么对、什么不对，而是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而且还不用她亲自说，只要你听说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去干什么。

那一次，戚本禹其实是来调研的，各派的头头儿都到了，谈谈各自的观点。当时乐团“好得很派”的头儿叫陆公达，是个拉大提琴的，上海人，跟我同届、不同班，没上大学就分去了。那天他是侃侃而谈，给戚本禹的印象非常好，后来

他就“失踪”了，总得有两个来月，谁也不知道哪去了。等到1967年“五一”的前夕，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坐着一辆上海轿车到音乐学院。那时候上海轿车是高干车，再高就是苏联的“吉斯”，那是毛主席坐的豪华车，部级干部是“上海”。那次，陆公达还带了两个秘书，因为他是“好得很派”，所以直接就去找了的那些哥们儿。一见面，大家很惊讶，陆公达说：“我现在的官儿，比你们想像的大一万倍。”大家都惊呆了，说：“你他妈当什么官儿了？”因为都是同学，还开玩笑呢。他说：“现在不便讲，等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第二天见报。因为“五一”了，国家总要宣布一次领导人名单，这是共产党的惯例，逢年过节都要宣布一下政界头头脑脑，排个座次，就是说传递一个信息：谁还活着，谁死了，谁在台上，谁他妈已经靠边站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登了中央各部负责人，其中最后一个：陆公达！

那时候，他跟我们一样大，往大了说二十四岁，大概也就二十三，他就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主管“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组阁。当时文艺组报了几个名人，比如写《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英儒等等，这些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是江青钦点的。现在看来，陆公达就是在那次戚本禹接见的時候，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一下就飞黄腾达了。

十二

就北京文艺界来讲，最热闹的派仗截止到“一·一九”夺权，之后再没有那么轰轰烈烈过，所以很快就没事干了。对我个人来讲，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在1967年5月。那时候在全国范围内，文革正逐渐从“文斗”发展到了“武斗”，群众组织的双方不再是辩论了，不再推推搡搡，而是成千上万的人被发动起来，棍棒、长矛、弹弓，甚至于动刀、动枪，拿着迫击炮就打。四川武斗最厉害了，因为过去它属于备战的“三线”，很多兵工厂都在山沟里，所以四川武斗也最有条件，直接仓库打开，每人一把枪，各派都是拿出去就打。于是，我们“红岩”组织了一个小演出队，也就十来个人吧，有唱歌的、拉手风琴的，直接杀到成都去，宣传毛泽东思想。

到了以后，我们住在四川音乐学院。一天下午，大概一点来钟，正睡午觉呢，突然被吵醒了，说是成都南门外正武斗。成都当时分成那么几派，一是“产业军”，

就是周围那些大的兵工厂的工人，一般都是复原军人，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他们是保皇派，要保省、市委的。还有就是“八·二六”，1966年8月26日成立的，都是当地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他们是造反派，要打倒省、市委的。还有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是成都中学生的红卫兵，也是造反派。

当时中央已经宣布夺权了，各地都在夺权，所以“产业军”就被赶到郊区去了。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保持着，并没有散，省委里面、甚至中央里面都有人暗中支持。那天听说武斗了，我是特别兴奋，我们这十几个人也丁丁光光赶快去了。一会儿就看见医疗队的人，抬着担架、拎着急救箱也上去了，那跟打仗一样。越走越接近所谓“前线”，这时候就开始紧张了，因为已经看到有伤员被拉下来，好多都是北京来的中学生——真正四川人都不怎么往前冲，倒是北京去的学生冲在最前面。有一个人让长矛把肚子扎穿了，在那儿哇哇哭，医生抬着往下走。当时那种感觉非常恐怖，就觉得，今儿我也可能就撂这儿了，而且我一回头，突然发现，我们音乐学院的这些人没有了，就剩我自个儿了。

那时候我身上有一块手表，瑞士山度士，那是我爸爸50年代从银行买的走私货，当时也算一大件了。于是我把它拿下来，别在腰带上，我怕他妈打起仗来，把它丢了。上去以后，远远看到“产业军”的人，大概有那么一里地左右，一水儿的长矛、柳条帽子，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这边中学生、大学生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拿着绷弓子、石头，而且也都跟我一样，手表别腰上，就那么往前冲，也是唱着语录歌。敢情这边儿保卫毛主席，那边也保卫毛主席，当时我忽然就觉得：“我们这是干嘛呢？如果死这儿，算什么呢？”

正这个时候，那边儿“冲啊——”一声巨喊，千军万马全出来了。这边儿是撒丫子就往后退，反正大家都害怕，越是胆儿小越跑得快，只恨自己两条腿短，最后剩下胆大的，就看你回来、回不来了，哈哈……

在这之前，唉呀，那真是赴汤蹈火，随时准备献身的。至少从我的角度讲，要么你就上学、工作，这么无聊的度过一生，要么就像千万个烈士那样，为人类的事业而奋斗，轰轰烈烈大干一场，将来名留青史。但是在那一刹那，忽然我就觉得，毫——无意义，如果你今天死在这儿，真是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包括音乐学院也是，什么你滚出去、我冲进来，对了、错了、红的、黑的……，其实什么不说明，什么都不是。所以自打那次以后，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大家也觉得，

忽然方昕就变成了逍遥派，虽然也去、也露面，但是没什么主意了，没说再领着大家干点儿什么“大事”。用当时的话讲，叫“革命意志消退”，从此销声匿迹了。

在四川，我们还到132厂去参观，当时已经武斗完了，那真是惨不忍睹。

132厂在郊区，是一个做“米格”飞机的大军工厂，工人全部是“产业军”的主力，是成都“产业军”的大本营。因此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就把它给围了，水泄不通，也不让那些工人出来，然后就在外面拿大喇叭喊，喊口号、唱歌，要彻底粉碎反革命的老巢。就这么闹、闹、闹，终于有一天，他们开枪了，从厂子往外面开枪。刚开始的时候很乱，只是看到有人倒下，后来明白了，是里面开枪，红卫兵整个儿冲进去，局面一下就失控了。车间里，“产业军”工人把硫酸水从楼上往下倒，有的红卫兵都给烧烂了。

毕竟厂子里的人少，那些“产业军”就都跑进后面的荒山。后来我们去参观，看见“产业军”用血在墙上写着“头可断、血可留，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然后是红卫兵在这边写着“红司令带领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也是用血写的，都是我们亲眼所见。后来在成都医院，他们把那些死人泡在福尔马林里，用个大玻璃瓶装着的，给大家讲，说这是哪个学校的中学生，怎么怎么死的。

（1967年夏，方昕在音乐学院）

1967年的7月份，我去过一次西安。那时候已经没有“大串联”了，像我这么跑的人很少，因为我的一个表哥在西安工业大学，我就带着宣传队去找他。当时各个学校都分成好几派，比如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但“派”是一样，彼此



之间都有联络。一次，有个学校打起来了，向西安工业学院他们这派的人发求救信号，于是这些人就坐着卡车去。他们不是学工的么，自制了土手雷，把炸药灌在玻璃瓶子里，扔出去可以响的，他们就带着这些玩意儿，大半夜叮里咣当坐着车就去了。没想到，跟他们对立的那派人学的是林彪的“围点打援”，半路上设了埋伏，把路挖得坑坑洼洼，叮里咣当那车翻了，炸药爆炸，把学生炸死十多个。后来，他们在学校操场上把那些炸死的学生展览，控诉对立面的法西斯暴行。那都是板车、床板，死人躺在上面，时间一长都黑了、臭了。大夏天的，整个西安

市的人排着大队去看，人特别多。因为我们是北京来的，可以不排队，男男女女捂着鼻子先进去，就看见那些红卫兵慷慨激昂在那儿讲，哇啦哇啦哇啦……(未完待续)

【检讨书】

胡乔木在 1956-57 年间的一些右派言论

(1968-9-15)

李慎之



李慎之 (1923--2003)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胡乔木对新闻工作和宣传方针发过很多指示，倾向肯定是右的。不过，我现在已没有当时的记录，有的当时根本就没有记录，因此现在大多已无法回忆，只记得几条“尖端”的如下：

1、1956 年苏共二十大刚开完，据吴冷西传达，刘少奇不知在一次什么场合，当着胡乔木的面说：“新闻界过去有许多清规戒律，都是乔木同志定下来的，现在应该破除破除了。”在这个黑指示之下，新闻界刮起了一股“自由化”的妖风。其中由刘邓黑司令部亲自出面搞的，就有现在已无人不知的刘少奇接见当时新闻界负责人的几次讲话，这些接见都是有胡乔木在场的。胡乔木本人也曾在那年夏天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把当时新华社部主任以上的人员约十人左右，召到他家里去谈破除新闻界的清规戒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鼓吹“自由化”。我还记得，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谈到过去学习塔斯社，其实塔斯社的新闻写得很不好，干枯简单，这时，胡乔木以一种“早有所知”的神态说道，“塔斯社的新闻写成那个样子是斯大林时代政治生活的反映”。胡乔木过去是一向鼓吹学习塔斯社的，在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后，大家也总认为他是拥护对斯大林的三

七开的评价的，现在一句话，既否定了塔斯社又否定了斯大林，其效果是异常恶劣的。

这次漫谈会上，也有人提到新华社应该发展国外记者网，建立世界性通讯社的问题，当时正是毛主席批评新华社“保守”，提出“要把地球管起来”以后，新华社的同志对于派国外分社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并且已经起草了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呈报总理转中央，总理还认为我们的干部培养计划太小，但是胡乔木对新华社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却冷冷地说：“派国外记者不是你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要看整个国际政治形势，人家连外交关系都不同你建立，还能让你派记者吗？”这一席话不但给大家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而且直接是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

这次漫谈会上主要的时间谈的是办报问题，胡乔木对中小城市报纸比解放前减少的情况大为惋惜，说到他家乡解放前还有一两张对开大报，解放后就都没有了，不胜感叹。对《大公报》由全国闻名的“知识分子报纸”改组为工商财贸界的专业性报纸表示后悔，甚至以他这个新闻界头子还表示“不知是怎么搞的”，这个论点与后来新闻界右派分子的论点完全是一样的。

2、1957年4月下旬，吴冷西曾有一次作了“中央政策”的长篇传达，其内容主要是现已为大家揭发批判的刘少奇“八千里走马观花”以后发表的大量黑指示，而他的开场白却是胡乔木的一段话。吴冷西说：“乔木同志最近谈了一下毛主席的心情。乔木同志说：‘斯大林时代统治的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残暴的统治，如果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下去，是不会千秋万世的，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设法使社会主义能够千秋万世’。”胡乔木的话是我所知道的对斯大林的最恶毒的攻击，但是尤其恶毒的是，他把毛主席当时正在考虑如何“灭资兴无”（这四个字到五月份就公开传达了）的战略部署说成是如何反对“斯大林主义”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腕，从他这个有着“主席秘书”的身份的人嘴里说出来，真是阴险毒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胡乔木接着还肯定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两大论点，即①斯大林错杀了许多“老干部”，②1953年苏联农业水平还低于1913年水平。吴冷西在当时的传达，我记得的就是如此。去年春天我看到新华社国内部庄重写的大字报，曾公布此次传达的比较完整的记录，可以向庄重调查。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胡乔木一贯的手法，他曾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向我们作传

达，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总是歪曲和篡改主席的原意。他多年以来就爱讲，“毛主席爱引用红楼梦上王凤姐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指我党）办事老是这样，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改过来。”其实毛主席坚持革命的辩证法，从来就认为矛盾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胡乔木的附加语，纯粹是与毛主席唱反调的“合二而一论”（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话最初发表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而胡乔木上述的话，在好些年前就一再讲过。胡乔木又爱说：“我们总是一条腿走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两条腿走路”。这里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也完全同后来在1958年大跃进中正式发表的这一口号（意思是几个“并举”）毫无共同之处，而纯粹是一种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在哲学上是平衡论，“合二而一论”，在政治上就是“多元社会论与多中心论。我上面所写的是胡乔木（原稿没复写上）……地讲的，是他一贯的思想。

我还记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达平山，新华总社也从太行迁到平山以后，我们第一次到西柏坡去听胡乔木的讲话。他就“告诫”我们：“不要以为革命天天都在前进，也有后退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到处都是光明，也有黑暗的地方”。这些话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出于他这样一个人的嘴巴，因而也觉得很“权威”。其实，这就是他一贯主张新闻报导要“全面”，要“写真实”，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实即所谓“暴露黑暗”）那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张本。类似这样的话，我相信，凡是在胡乔木领导下的人是多次听到过的。凡是认他为“权威”，而想从他的话去领会“中央”意图的人，肯定都会中毒于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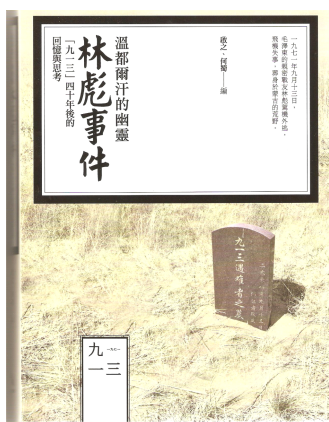
【书讯】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周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在台湾出版

韦陀

2011年4、5月间，为纪念“九一三”四十周年，《记忆》向读者发出征稿信，请大家撰写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回忆或评论文章。同年8月，《记忆》与文衡文化公司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九一三’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为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此书即是这些回忆、评论和学术论文的结集。

此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回忆与评论”，第二辑是学术论文。回忆与评论



按照撰稿人当时的身份，分为军人、工人、干部、知青、中小學生、政治犯、外国人等七部分。共收入了28人的文章。学术论文有的篇幅太长，编者无法悉数收入，这里收入的是作者提交的另外的较短的作品。

出版方原拟将回忆与评论与学术论文分为两本书出版。但在两书已经编辑完毕后，出版方改了想法，决定将两书合一本。因此，此书有了两个前言。

第一辑的前言中所说的字数，指的是本辑的字数，而非全书的字数。

此书书名全称：《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周年后的回忆与思考》。启之、何蜀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4月出版。定价台币540元，秀威网站有售。

【书讯】

《阅读文革》在香港出版

向胡扬

这是一本书评集。如书名所示，其所评之书都是关于文革的。全书共收了52篇文章，评论了45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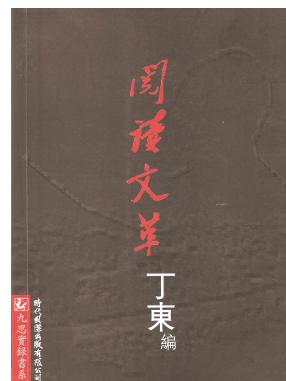
编者丁东在序中对这些书做了如下介绍：“从内容看，有文革通史，有专题研究，有传记、回忆录和口述史，有文革史料集和个人文集；从作者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历史当事人，也有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从出版地看，香港和海外的出版物较多，大陆的出版物较少。”

编者在序中阐述了自己“在选择书评对象和评论文字时”的价值取向：“它既不同于毛泽东对文革的全面肯定，又不同于邓小平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独立的语境，其特点是把文革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用历史的精神来叙述，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

“本书选择的文章，基本上属于这种独立的语境。有的只是一家之言，一面之词，一得之见，但在呈现历史真相上有独特的努力，或许有助于读者穿越权力对历史的遮蔽和扭曲。”

在此书收入的52篇文章之中，有29篇文章出自编者之手，其在文革研究方面的博览和勤奋可见一斑。就此言之，此书称为丁东编著，似更为准确。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还收入了三篇述评和综述类的文章：丁凯文的《“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研究述评》，董国强的《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和邱新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邢小群的《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和阎长贵的《关于两种文革资料集的比较和建议》等人的概述性的文章亦被揽入。书后附有《记



忆》书目编纂小组提供的《“思痛文学”主要中文书目初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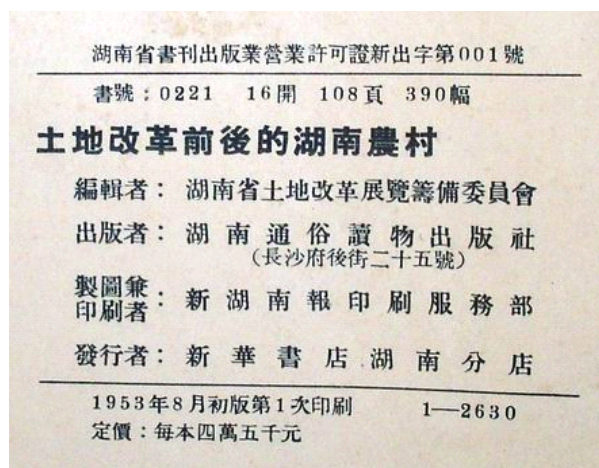
此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12月出版。定价：港币110元，台币400元。

【资料】

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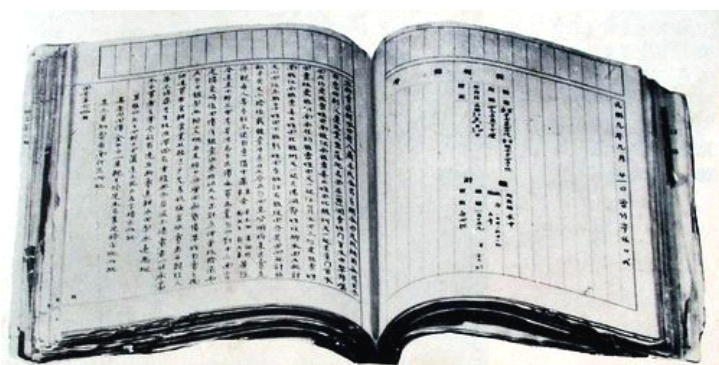
——万恶的封建制度、野蛮的地主阶级

任冬林 整理



下面的图片及文字摘自《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8月初版，定价：四万五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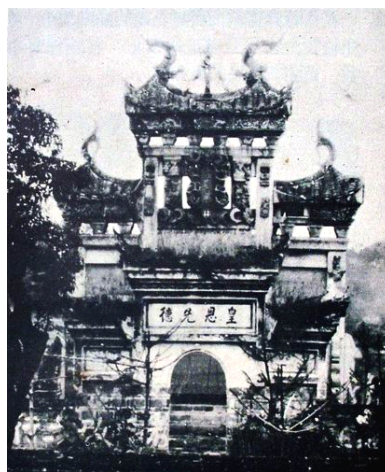
在舊社會裏湖南農村土地的高度集中，在中國南方各省是比較突出的，比鄰近的湖北、江西都要高。土地集中的過程，充滿着農民的血和淚。



这是宜章大地主李芳源厚达百余页的“财产登记簿”，上面写满了霸占农民田产的契

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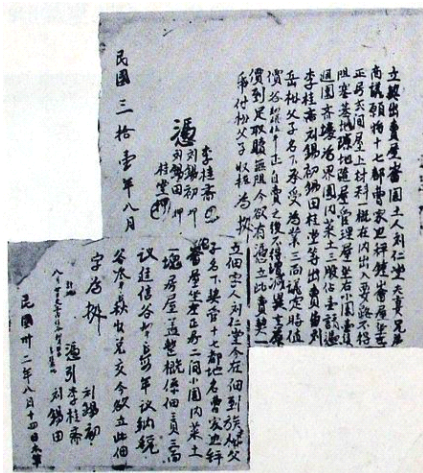
“跑马占山”是封建王朝时代地主阶级强占农民土地的一种方式，隆回东乡大地主魏午庄的祖先魏万一（明朝）以“跑马占山”的手段霸占农民土地的一部分。这是魏午庄花万多两银子、三年多时间，修建的一座牌坊，他把自己的丑恶的发家史，夸耀为“皇恩先德”，欺骗农民。（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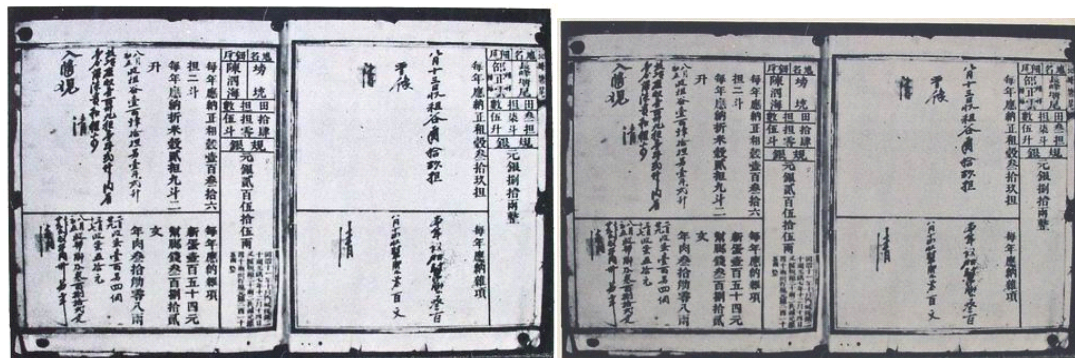
湘乡十三区农民刘仁堂，被地主刘岳松逼

债，只得将自己的房地出卖给他。因无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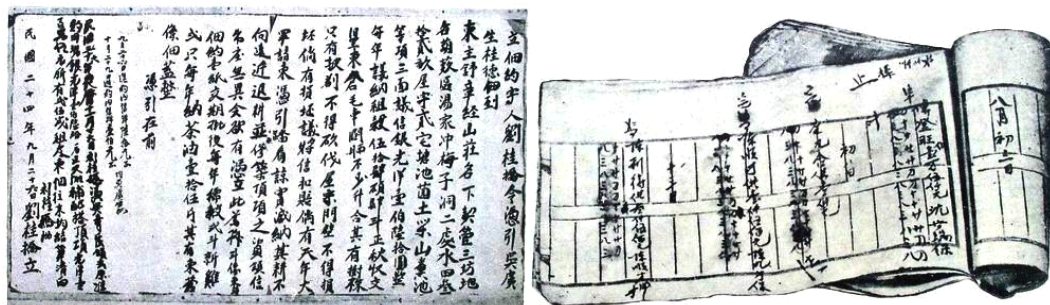
安身，又被迫向地主租用自己的房地。上：出卖字据。下：佃租字据。（左图）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大肆掠夺革命志士的田地和房屋。这是伪宜章县政府发给地主肖仰忠强占烈士肖友富土地的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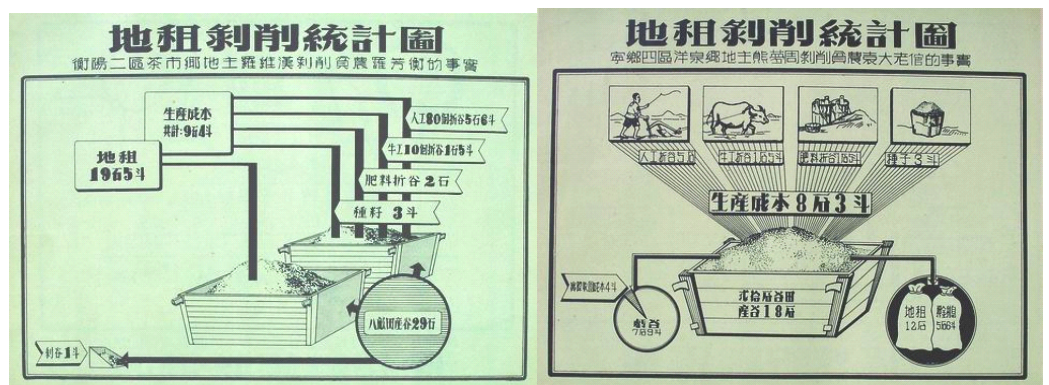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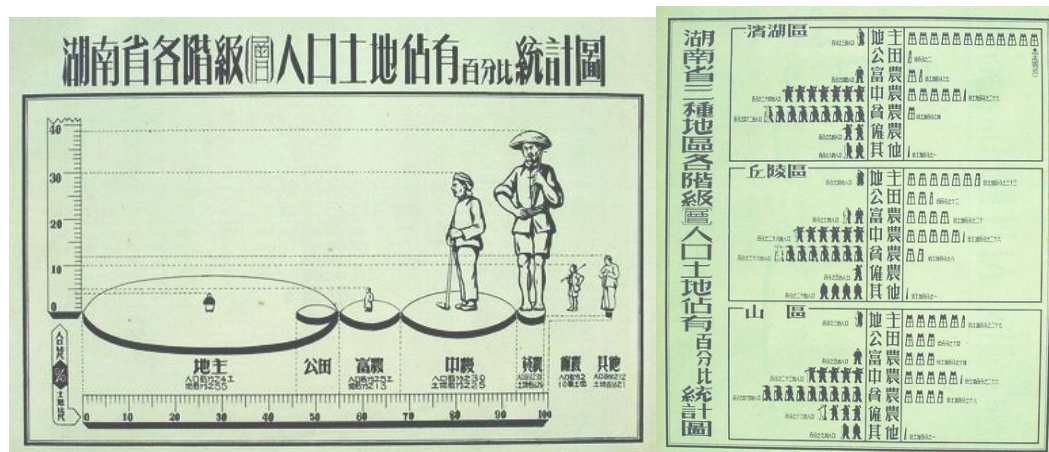
长沙新开乡大地主唐建中专印了一种收租簿，上面不但有交租交押的数额，并规定要交纳新蛋、年肉、帮脚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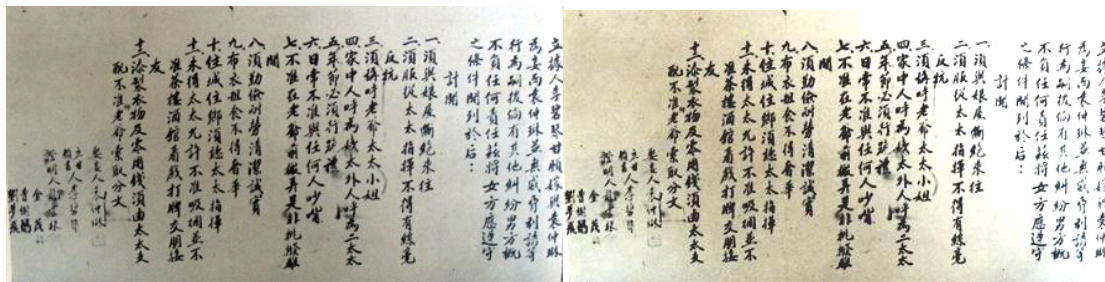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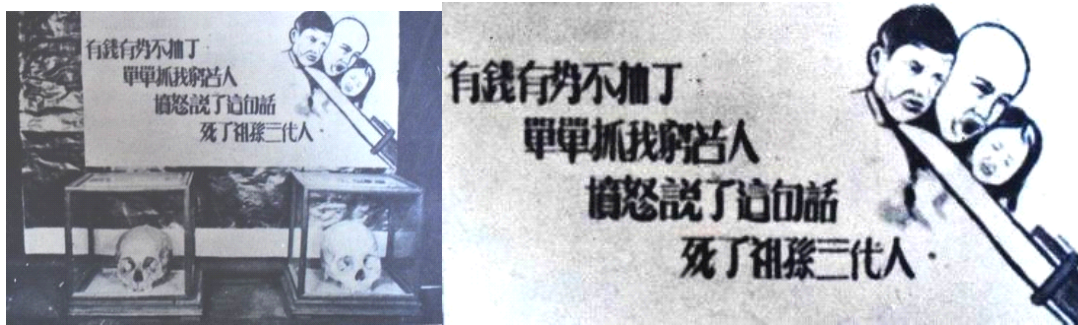
湘乡农民刘桂桥承租地主舒章经的田，佃约内不但有交租交押的数额，并规定要交纳糯谷、新鸡、茶油。

“五日会”是湘南一带流行的一种高利贷方式，五天计算复利一次，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宜章农民李来胜，一九四五年七月借地主李世俊伪币六千元，三个月就滚成伪币六十七万多元，逼得卖了房屋才还清这笔账。

地主使用非法的度量衡和其他剝削工具來剝削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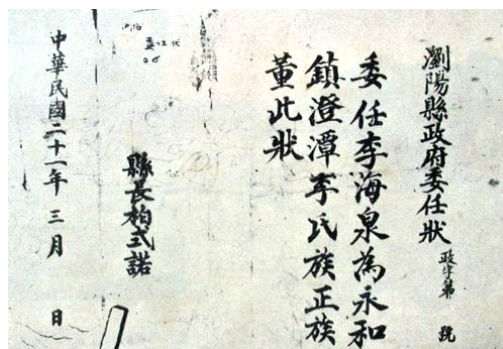
地主是官僚在農村的支柱，官僚是地主統治農民的依靠，他們爲了共同的利益，勾結起來殘酷地迫害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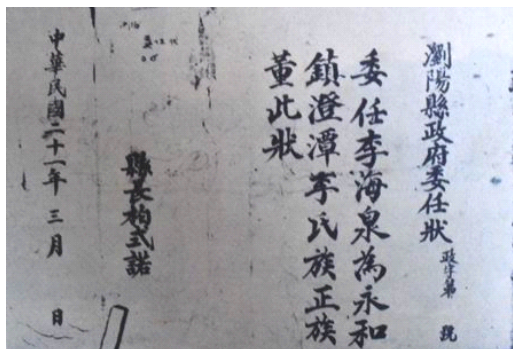
衡山大明乡地主袁仲琳，一九四七年任桂阳伪警察局长时，强霸贫民李碧琴为妾，并逼迫她在这张字据上画押。

地主階級利用宗法族權統治農民，利用封建迷信麻痺農民的階級意識，他們想藉助這些東西鞏固其反動統治，達到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目的。

醴陵盐山乡地主陶思安，利用宗法族权统治农民，常以违反“族规”为名，把农民抓到这块灵主牌子前拷打责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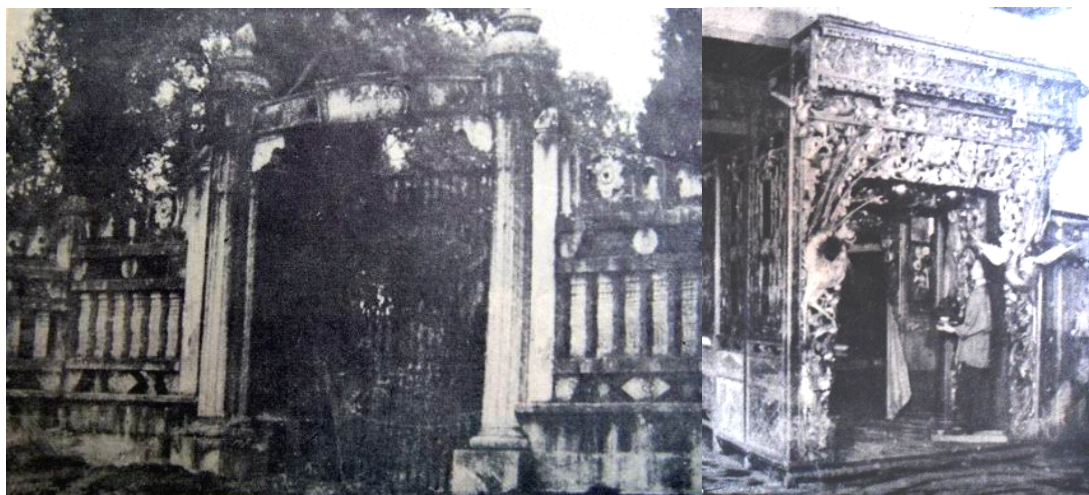
地主阶级依仗反动政权的势力，对农民进行宗法统治。这是浏阳永和镇地主李海泉从伪县政府取得的“族董委任状”。



地主階級統治和壓迫農民的殘酷程度，具體表現在他所使用的各種刑具上，凡木枷、「快活凳」、站籠、竹板、鐵鏈、虎頭鉤、刀槍、火叉、溺人桶、溺人梯等，應有盡有。



地主阶级的生活过得极其豪华、奢侈，他们住好的，用好的，把骄奢淫逸的生活完全建筑在农民的痛苦上！



湘潭四区大地主伍蔚湘花七万多光洋修建的“伍家花园”。
 常德韩公渡区地主高秉坤家花了三千一百八十五个雕工做成的“八步白鸟出窠床”（照片中的人是制作的模型，床是原物）



东安伍家桥乡地主顾畴用一千五百块光洋雕刻的“千工床”。

慈利六区地主彭果成家的水红丝绵袍。

湘阴义福乡地主易品珊用一百二十石谷买的水獭皮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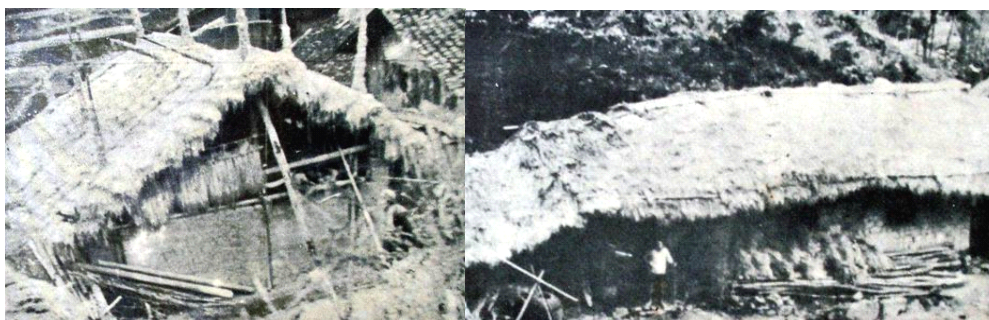


邵东白玉乡地主曾甲秋，花二十多个竹工用细竹编成的“隔汗衣”。

南县北河乡地主孟汤之老婆的尼龙袜。

沅江兴乐乡地主郑国俊的小老婆跳舞时穿的尼龙旗袍。

受壓迫受剝削的廣大農民，他們的生活又是一個樣子：他們吃不飽，穿不暖，房屋不避風雨，……有的甚至被凍死，餓死。因此，他們的階級仇恨是很深的，他們迫切要求得到翻身，得到解放！



祁东洪桥乡贫农彭兴村全家十四口人住的破茅棚。

【来信选登】

1、宋淮云致函《记忆》:

《记忆》主编，您好：

我是原北京四中校长杨滨的女儿宋淮云，看了记忆第82期，第101--102页的报道，想说明一下，王晶尧先生和刘秀莹女士不仅没有在67年4月23日去过我家，而且我们三人从未一起见过面。刘秀莹女士在文革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去过我家，三人在我家会面，与基本事实不符。其中的谈话内容也就无从谈起。特此澄清。请代向王先生致以热诚的问候，卞校长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好！

宋淮云

2012-4-27

2、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记忆》编辑部：

我阅读了《记忆》第82期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宋淮云、刘秀莹谈华记录——1966年8月6日的广播稿》，署名王晶尧。

对这篇文章，我做三点声明：

一、我于1965年调出师大女附中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4月5日正式调离师大女附中，到中共西城区委办公室工作。1967年调西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办公室工作。当时组织上规定，不许参加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二、从1966年8月到1967年，一直到2008年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刘进广播了什么事情。

三、在1967年直到现在，我从未去过宋淮云家，到今日也不知宋淮云住在什么地方，更没有和王晶尧先生、宋淮云一起谈过什么话。

请将来信照登。

刘秀莹

2012年5月7日

3、匡卫群：“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

近日又认真看了一遍卞校长铜像揭幕仪式的光盘，才敢写下一点感想。

一位作家说过，每一部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文革那段历史面前，一切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那实在是一个难以记述的悲惨世界。要真实记述那个时代，不但需要正直和良知，还需要深刻的思考与敏锐的洞察力，更需要太史公“人固有一死”的勇气。然而，做齐简晋狐的史官难，做含泪劝民的佞人易。因此，在一片盛世的升平声中，在“文革”已成敏感词而被屏蔽的今天，能够看到这样的一部振聋发聩的片子，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是的，这是我看过的记叙文革的影视片中，最令我感动的一部。虽然它只是记录了一个铜像揭幕仪式，但是那些参加者的发言，和一幅幅历史画面，又将我带回那个惨痛的日子。为了写《食指》，我已经将那个日子烂熟于心；但是，再次面对卞校长浮肿的遗容，听到学姐们泣不成声，我依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它是没有大家的大家之作，足以与那部《我虽死去》相比肩。全片的解说生动准确，画面简洁流畅；小林先生的诗歌，满里先生的配乐，平英学姐的朗诵，都已臻化境。更宝贵的是几位学姐对“8.5”事件的反思，从国家民族层面，解剖当年自己，也解剖今世人伦，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没有几十年沧桑岁月的积淀，是写不出这样泣血的诗歌和文字的。如果我是母校领导，我会要求学生们在开学时都看一遍它，让他们永远记住，在这个圣洁的校园里，曾发生过怎样的邪恶！

而在邪恶发生后，他们的前辈，曾以怎样的良知和勇气，直面地上的鲜血，做出真诚的忏悔与反思！

“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对于母校学生，这段话实在是应该终生铭记的校训！

我很佩服高宁学姐说的话：“我们也是这件事发生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用我们的行动去忏悔、去谴责、去反思，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份承诺与担当。”

“对社会的承诺与担当”，掷地有声啊！

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同一条河里淹没两次，上天不会再救你。痛定思痛，回首我们亲历的那个年代，我们该反思什么？

上周重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面有段话，简直就像专为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所写的。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动因时这样说：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究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指明了关键所在：要弄清是什么使中华民族在十年文革中全体疯狂，就要弄清是什么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的头脑中。简言之，那时的我们和那时的领袖，在追求什么？要实现什么？

那时我们所追求的，是从小就被父母和国家灌输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共

产主义”。领袖又告诉我们，实现这个主义的最佳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反修防修，就是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打倒他们，这一事业就会夭折。因此，当大多数学生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满腹牢骚时，领袖扔出的一粒火星，就足以引爆怒气郁积的火山。革命激情与崇高理想，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催化剂，而暴行一旦披上神圣的外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而领袖所毕生追求的，不也是那个“乌有之乡”吗？虽然事后看，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打倒刘，夺回失去的权力，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为了实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梦想。权力与梦想交织，实现梦想必须手握大权；“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对这个铁血法则，他当年在中央苏区被排挤受打击时，就有切身体会。在中国闹革命，自然要遵从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第一条是“朕即国家”，用俗话说就是“老大说了算”。领袖没当上老大时，连颗星星都不是；一旦当上老大，就成了红太阳。规则第二条是“党即法”，党的决定就是法律，党的领袖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规则第三条是“成王败寇”，或者说是“你死我活”。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无不“身败名裂”。领袖一生视权如命，因其深知规则之无情。在这套规则下与天与地与人奋斗，最终演绎了十年内乱，这是领袖的悲哀。

而领袖以下，从刘主席，到我们的父母，对这套游戏规则又何尝不是奉为圭臬？从延安整风，到开国后反梁漱溟、高饶、胡风、反右、批彭黄张周，一直到文革，父辈们不都是虔诚地按照游戏规则，跟着老大斗来斗去吗？刘主席在文革中挨斗时，拿出宪法小本，高呼自己是国家主席，受宪法保护；他忘了按照规则，只有老大才有挥舞宪法与党章的权力；他也忘了那些胡风分子和几十万右派们，当他们的信件被查抄、日记被没收、人格被污辱、因提点意见就身陷囹圄，或被发配夹边沟化作枯骨时，宪法何在？公理何存？而卞校长，当她屡遭批斗，受尽羞辱，预感到性命不保时，她唯一能做的只是给上级党委写信诉苦，而不是状递法院寻求保护。这不是她愚昧无知，她清楚地知道，按照规则，除了党，没人能救她。这是卞校长的悲哀，也是我们父辈的悲哀。

十年内乱结束后，我们的父辈终于明白，不但那个主义遥遥无期，就连“小康”的门坎，我们都距之尚远。党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将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实现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总结领袖所犯错误时，重在评定功过是非，对原则问题却轻描淡写，因为中国需要新的“英明领袖”，而新老大只能按老规则产生。邓大人主政后似乎有改变规则的想法，但实践证明，他若不当老大，连经济体制改革都可能夭折，改变规则不是简单修改一下党章宪法，它涉及整个国体政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六四”之后，他不得不收起改变规则的念头，一心推进市场经济。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规则未改，政治上的隐患日益显露。在开国元勋相继谢世后，像领袖那样的绝对老大已不复存在。自上而下的制约逐渐弱化，权钱交易的诱惑不断膨胀，使得许多小老大越来越为所欲为。贪污腐败猖獗和贫富差距加大，正成为民怨火山的两个突破口，随时可能会猛烈喷发。人们发现，现状与历史竟日益契合；社会转了一圈，似乎又要回到文革的起点。

更可怕的是，一些投机者敏锐地察觉了民心可用，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呼唤回到毛时代，鼓动弱势群体揭竿而反。其目的，不过是想自己当个小老大。而他们共同为之造势的薄侯，也正做着“时势造英雄”的老大梦，想在政治博弈中占领制高点。平心而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作为政治家谋求最高位置并不错。但不能走回头路，重蹈领袖覆辙。薄父文革中十年冤狱，薄母自杀身亡，薄侯会对文革一往情深？无非是看到民怨可用，遂“颁新政，恤民情，吟旧歌，整吏制，兴新狱，杀旧吏，剿豪强，禁讼师”，虽权倾一时，但靠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为自己造势，终逃不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反而又一次落入“成王败寇”的历史漩涡，这是薄侯们的悲哀，却是人民的福音。事实证明，历史是在螺旋上升，绝不会回到文革的起点。

薄侯的倒掉，昭示着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特殊时刻，看到这张“警世通言”，感慨良多。正是由于对文革的反思不彻底，对规则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才为薄侯的旧调重弹提供了条件。如果当年的红卫兵，无论是否施暴，都能像学姐们这样真诚忏悔，深入反思，勇敢探索。我相信，产生暴力的土壤定将清除，束缚父辈的规则定将改变。看看海峡那边的变化，便知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却没能完全结束专制体制，这是时代所局限，我们不能苛求。而我们已经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建设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民共

和国而奋斗。学姐们为卞校长所做的一切，正是为这座宏伟大厦所添加的一砖一瓦，不但惠及当今，还将泽润后世。

原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实验中学）校友

匡卫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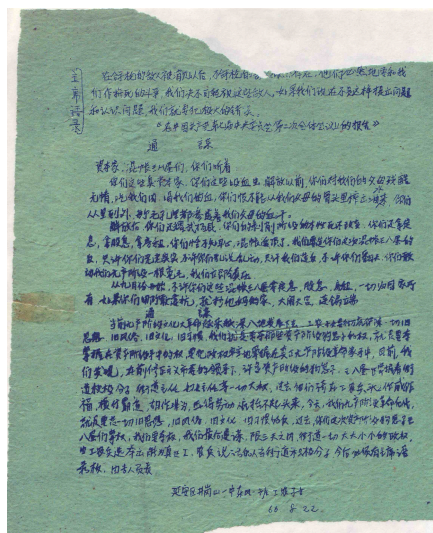
2012-5-30

4、沈迈克 (Michael) 谈文革资料收藏

上周有机会接待来隆德大学访问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杨志刚教授，跟杨教授在休息期间谈谈“文革”资料的征集和保存工作（据了解，复旦大学新成立的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将会比较重视对包括“文革”十年的当代草根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之后，我想起了我办公室那一故纸堆里的一小部分原始红卫兵小报和传单原来是怎么搜集到手的，决定致信《记忆》，通过同仁刊物向（主要是国内）读者介绍一下海外“文革”研究的微小趣史。

我在八八年一月份，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博士后身份首次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时候，听已经在那里时间比较长的中国学者说“这边”（特别是哈佛

燕京图书馆）“有很多很多红卫兵资料”。结果一看，我发现其实没有多少，不过是一些影印的东西以及什么缩影胶卷等。当年，最大的一整套资料为约二十大本的《红卫兵资料》，内容主要是北京地区（还有两广以及西藏自治区）的红卫兵小报。除此以外，八八年在哈佛还有一套该资料的《续编》（十本左右）和二十几本当时还没有上架的绿色书皮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复印件，当时因为费正清中心的人还忙着以后面这一套书为基础编译出一本英文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所以对



对这些《万岁》本子还对外“保密”，如果不是哥们儿齐某（邓拓专家，澳洲人，当年刚刚拿到哈佛博士学位的）敢为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国际友谊的进一步巩固而破规拿出来给我瞟一瞟。我当时还看不到。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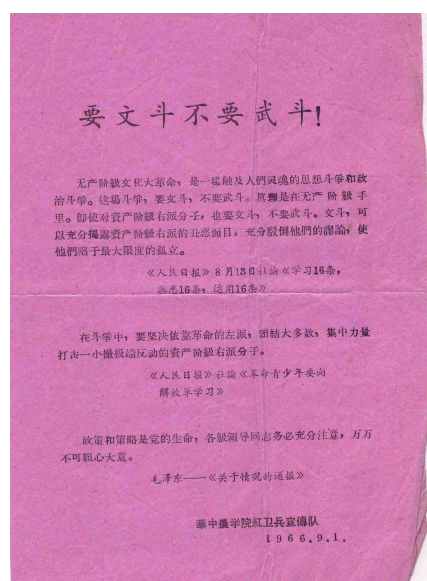
来这套《万岁》就解密了，而且我还把自己收藏的若干本借给哈佛让他们复印。

下面就从刚提到的那一套二十大本复印的《红卫兵资料》继续说，当年我还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以为不过就是什么“中央情报局”从香港那边搞来的呗！几年以后，发现其中大约一半红卫兵小报和传单并不是那样，而是经过我自己的北欧某国才到美国以及哈佛的！

七十年代以前，海外学术界无法把多少红卫兵资料搞到手里，因为当时在海外这一类资料基本上（不是全部）都在“非学术界人士”（即情报或外交机关工作人员）的手里。到了七十年代初，首套这一类资料才“公转民”了，通过于华盛顿 D.C. 名字叫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机构先以缩影胶卷的形式，后以复印件的形式，卖给世界各地大学图书馆的。此“中心”在当时冷战条件下是有一点特别，我还记得我还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图书馆“半工半读”时，看到了它的订书目录，是专门提供各种来自美国人称之为“红色中国”的图书资料的复印件（黄色书皮的），所复印的东西包括一些现在看来可能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从云南省，经过泰国或缅甸，弄到手的，然后台北方面又让老美“共享”的，因为至少有那么几本是西南某机关出的。另外还有两、三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当年从“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买来的资料不多（馆长嫌太贵！），四十年过去了，如果耗子还没吃掉的话，现在大概都存放在 Skeppsholmen 岛上的“东亚图书馆”资料库里。今天早已进入所谓“后潘家园年代”，估计仍对它感兴趣的人没有几个，东亚图书馆网上的图书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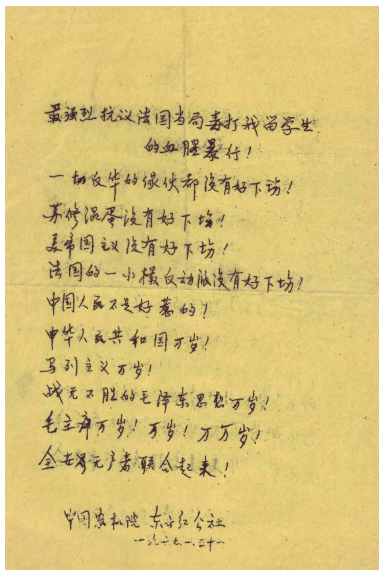
（<http://webbsok.mikromarc.se/Mikromarc3/Web/search.aspx?ST=Normal&Unit=6473&db=smvk>）可能都没收录。

至于二十本《红卫兵资料》里北京地区的《井冈山》、《首都红卫兵》、《红旗》、《新北大》等小报，我到了九十年代初我才偶然发现它原来不是什么“美蒋”情报系统抢过来的，而是北欧某有好国家在文革初期驻京大使馆的文化官公开收



藏的。大概是九二年，有那么一位曾经一九六七年前后在北京任文化官、后来在北欧某大学社会科学教研室任教的汉学家，碰见我说他准备退休并由乡下的大房子搬近大城市里相对小的单元去住，听说我迈克搞文革研究问我要不要继承他当年在北京搜集到的一大堆红卫兵材料原件？我说，当然愿意要，你不打算再保留的话，我保证提你好好保管，还可以编个目录什么的，OK？他说话算数，没过几天以后把几个纸箱子送来，放我办公室地上了。我一看箱子上的“寄件人及地址”发现是美国华盛顿的那个“中心”，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当年他曾经借给美国人，让他们复印的，后来退还给他以后，再没打开那些箱子的。我说，哎呀，我这几年只知道有个使用够麻烦的缩影胶卷的一套和字十分不清楚的影印件一套，不爱看，看着头疼，结果原来的完完整整的原件都在你家库房存放着！他回答说，有一小部分当年没借给美国人，你到时候慢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的。

这些红卫兵小报、传单等是怎么样的呢？“小报”没什么特殊，现在大家都收悉的很，不用我多讲，但传单还比较好玩，值得一提，其中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注意事项（1966年10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搞好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口头宣传要点）（1966年9月）》、《红卫兵对驻京西方资产阶级记者谈话纪要（1966年12月）》、《延安区井冈山一中东风一班工农子女〈通牒〉（1966年8月22日）》、《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革命师生〈革命的倡议书〉（1966年8月21日）》等各式各样的“彩色”原件（纸经常时红色的或黄色的）。美国人复印时一律把原搜集者在原件上的标记给涂掉，现在仍能看到的用圆珠笔写的“67年1月25日晚”（写在当天出的《华北局印刷厂夺权指挥部〈一件反革命事件〉》油

印传单上）、“67年1月30日‘外交’”（写在内容为“解开外国专家局”某群众组织的内幕的传单上）、“（某外国人的名字）某月某日”（大概是此人当天在大街上捡到的传单）、“与谢富治讲话那个传单同时发现的”（捡传单者的注释）、“使馆小孩子在胡同里捡的”（!）、“11日1月67年10时半，工人体育馆旁边”（写在铅印的一张《首都红旗赤卫军宣言（第一次修改草案）》上）、如此等。有的传

单内容对当时驻京的北欧文化官来说，读起来显然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在“赤卫军”的“赤”字下面标记拼音 chi 的罗马字，在聂元梓的大名旁边有 Nie 的罗马字（奇怪的是“梓”这个对外国人来讲相对少见的字旁边没有加拼音！）。还有，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因为没有好的现代汉英词典，北欧汉学家需要解读人民共和国的“语境”时，若需要查词典的话，平常就查北京出的《汉德词典》（跃进年代的产物，错别字非常多！），这可能说明为什么传单原件上在拼音字母旁边还经常出现德文的译文，如“谈判”旁边写着 verhandlungen, besprechungen。以上几百份（张）原件现在都在我隆德大学这边放着，是我全部个人文革资料的小小的一部分，前年唐少杰教授来我校当访问学者时，建议我搞一个什么文革研究资料库，我说可以，将来大概只能如此。最近听北大的印红标教授说他在编辑“全球文革资料存目”，到时候先让他把我的东西编进目录去，再说别的。“文革”史料是准备留给下一代人做研究用的，不打算拿它去喂肥或“造福”小耗子的。

瑞典 隆德大学

沈迈克

2012年5月13日

